臺大歷史學報第 59 期
2017 年 6 月，頁 119-170

BIBLID1012-8514(2017)59pp.119-170
2016.2.3 收稿，2016.11.2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3

地志書寫與家國想像——民初《大中華地理志》的地方與國家認同

劉 龍 心*

提 要

本文以民國初年中國地學會成員林傳甲（1877-1922）編寫的《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為中心，探討近代以來地志書寫和知識轉型的關係，並分析這套具有教科書性質的地理志如何在民初競爭劇烈的教科書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以及這些描摹家國想像的地理知識背後所寓涵的地方與國家認同。

表面看來《大中華地理志》以省、縣為單位，延續清末以來鄉土志「愛國必先愛鄉」的思維，是一套從地方認識出發的地理教科書。然而細究其內容，可發現均質化（homogenization）的書寫框架，以及國家凌駕於地方的特色，在在顯示出從地方概念入手的《大中華地理志》仍然包裹在強烈的國家認同之下，而歐戰危機帶來的國亡種滅之憂，更強化了林傳甲以國家為主體的意識。因此《大中華地理志》在某種程度上雖然可以視為清末鄉土志的遺緒，但長期以來對地方缺乏深入了解的讀書人要如何重新建構一種從地方出發的知識，顯然需要更多摸索。

關鍵詞：林傳甲 《大中華地理志》 地志書寫 地方 國家 認同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1102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E-mail: longhsin.liu@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林傳甲與《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
二、從微分到積分，從地方到國家
三、有國無家？——地方與國家認同
結 語

前 言

自 20 世紀初清末推行新政開始，在清政府的鼓勵下，不少地方士人紛紛提出纂修地方志的構想，根據傳統方志體例編修鄉土志或鄉土教科書。這波因應新學制而起的鄉土史編寫風潮，由於出現在立憲運動的背景下，在概念上又受到 1902 年梁啟超（1873-1929）〈新史學〉的影響，因此普遍強調國民教育、國家觀念以及愛鄉、愛國的思想，並且有意勾連鄉土和國家之間的關係。[1]然而，民國以後，這波為時不算很長的編寫鄉土史和鄉土教科書的風潮，因愈來愈多地方教育人士參與纂修，形式上也日益趨近教科書的課目體例，逐漸脫離方志體而獨立，因此一般地方士人對於地方歷史和事物的關注，旋即轉化成另一波纂修地方志的動能。

然而各省方志大多自同治、光緒年間纂修後，已歷四、五十年未曾續修，地方文獻散逸和失落的情況十分嚴重，加以民國以後政治、社會情狀陡變，各省編修地方志的成績十分有限。[2]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一時期纂修出版的方志正處在民國肇建、帝制轉向共和的階段，地方和中

1 程美寶，〈由愛鄉而愛國：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北京），頁 68-84。

2 根據筆者初步的觀察，民國初年至 1940 年代前後，至少有三波纂修地方志的高峰期，皆與中央政府下達修志政令有關，一在民國肇建之初，一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全國形式上統一之後，第三波則在抗日戰爭中期。

臺灣大學出版期刊資料庫

央都想藉機重新釐定方志類目，以為共和張目，為地方自治揚聲，因此民初所修方志仍然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唯學界比較缺乏關注此一時期纂修的方志，不少討論地方志研究成果的文章只是幾語帶過，視此階段所修方志為清末民初的過渡期，沿襲舊例者多，沒有太多值得著墨之處。此間，若論及以方志為素材討論近代地方文化與國家認同的著作，當以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最具代表性。此書雖不完全以地方志為材料，但作者廣泛利用晚清民國以來廣東地區各種方志、文集、遊記和鄉土教材，細緻地分析「地方文化」在特定時空背景中建構的過程，以及地方和國家認同之間複雜的辨證關係。[3]

就在筆者近幾年將研究視角移向由地方士人纂修之地方志時，注意到一個集結甚早、人數頗多、壽命很長的地理學研究團體——中國地學會。早些年研究近代中國地理學的著作，如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1815 到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和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都曾提到該會。鄒書認為中國地學會是近代中國職業地理學群體的集結，為中國「體制化地理學共同體」出現的表徵，特別是其機關刊物《地學雜誌》，為晚清民國地理學界同行的定期接觸創造了有利條件。[4]郭書則是把中國地學會和稍早成立的譯印西文地圖公會視為近代中國最早成立的地理學專門研究機構，為傳統地理學向「近代科學民族地理學」轉化的重要指標之一。[5]近幾年韓子奇亦有 2 篇文章注意到此學會，其一是〈進入世界的挫折與自由——二十世紀

3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4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1815 到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309-342。

5 郭雙林認為中國近代「科學的民族地理學」大約出現在光緒、宣統年間，主要指標有三：大學地理課程的設置和新式地理學教科書的編纂、地理學專門研究機構的建立和專業刊物的創辦、地理學學科體系的形成和科學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見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7-12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初的《地學雜誌》〉，[6]作者認為中國地學會成員希望藉著地理學研究，掌握自己國家的資源和物產，以期與現代世界體系接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另一篇 “Marking the Boundaries: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Republican China” 則在比較《地學雜誌》、《史地學報》和《禹貢半月刊》3 種雜誌時提及中國地學會，韓子奇延續前文看法，強調該會成員普遍認為疆域的擴張和向外殖民是 20 世紀列國競爭下的常態，因此《地學雜誌》對於西方的侵略並未嚴詞批評，反而較多批判中國未能反思列國競爭之意，鼓勵國人開發地理資源，急起直追，趕上西方文明。[7]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各有關懷的焦點，但與筆者關心的問題卻不盡相同。程美寶的專書討論地域文化的形成，以及地方志如何表述國家觀念和地方意識等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放在地理知識轉型的脈絡下考慮的；鄒振環、郭雙林和韓子奇關注中國地學會的研究成果雖多從地理知識轉型的角度出發，卻未言及該會成員如何看待地方、表述地方，以及地方和國家的關係。是以有別於前述研究，筆者想具體而微地從地志書寫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切入，討論中國地學會成員林傳甲（1877-1922）及其所編纂的《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體現的地方與國家認同之特性，以及地理教科書對於形塑近代地理知識所帶來的影響。

歷來學界對林傳甲或《大中華地理志》研究成果並不多，論及林傳甲者，大多關注的是他在清末民初從事的地方教育事業，[8]或將焦點放在

6 韓子奇，〈進入世界的挫折與自由——二十世紀初的《地學雜誌》〉，《新史學》19 卷 2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151-177。

7 Tze-ki Hon, “Marking the Boundaries: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Republican China,” in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3-333.

8 不少研究者都是因為地緣關係才注意到林傳甲，如劉欣芳、王秀蘭，〈黑龍江近代教育奠基人林傳甲一家對黑龍江教育的貢獻〉，《教育探索》1997 年第 5 期（哈爾濱），頁 61-62；胡博實，〈林傳甲與黑龍江近代教育發展〉（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他的《中國文學史》，[9]視其為近代中國第一部文學史著作，[10]要不就是運用此書分析近代中國進化史觀的形成，[11]關注《大中華地理志》者相對有限，頂多在研究林傳甲生平時略事提及。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大概有幾種原因：第一，林傳甲早逝，《大中華地理志》在短短 4 年不到的時間裡，完成省及部分縣志調查，但和林傳甲最初預想的 22 省外加蒙、藏、青海等區畢竟還有一段距離，未完成的省份無人踵其志，其風潮旋起旋滅。其二，《大中華地理志》最初構想十分龐大，提出時引起學界不少迴響，但真正落實且需刻日求功時，卻面臨乏人相助的窘境。林傳甲承認，不少「老輩」批評他以數月成就一省地志過於草率，但他反倒認為這些「老輩」絲毫不關心國家危亡，只知「詩酒風流，於外人留心我國政治經濟毫不自覺」。[12]林傳甲視「老輩」如此，於新派人物亦不相與。[13]當林傳甲如火如荼編寫《大中華地理志》時，正值歐戰結束，國人為巴黎和會山東問題抗議最洶的時刻，許多學校因五四運動而

9 有關《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並不多，如陳國球，〈文學史的名與實——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考論〉，《江海學刊》2005 年第 4 期（南京），頁 170-175；余來明，〈清民之際「文學」概念的轉換與中國文學史書寫——以林傳甲、黃人兩部《中國文學史》為例〉，《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吉安），頁 99-104；郭琳，〈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胡適《白話文學史》比較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10 林傳甲、朱希祖、吳梅著，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1 王汎森，〈近代中國線性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 卷 2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1-46。

12 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收入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頁 2。

13 程美寶認為民國初年的地方讀書人經常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他們和遺老大不相同，大多服膺民國，願意學習和採用新思想和國家意識，選擇性地吸取中國和西方的知識，並且熱衷於地方事務。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 274-278。筆者同意程美寶的觀察，林傳甲的某些特性和這批地方士人接近。這批具有最後一代科舉功名出身的學人，對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堅持，卻擁抱共和，期待統一；對國家民族具有高度的憂患意識，願意接受部分現代化的思維和改革意願，卻自視與新派人物不同。

臺灣大學圖書館

罷課遊行，或提前結束課業放假回家。林傳甲對此大肆批評，認為教育部通飭各省學生暑假應進行鄉土調查，罷課無助於實際，[14]救國之道無他，唯「勤學好問而已」。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對學生走向街頭荒廢學業的不以為然；身為孔教會成員的他，[15]時時刻刻以發揚聖道為念，強調地理志應「引聖經聖訓，寓倫理於地理中」。[16]所以《大中華地理志》為時人評之為「作地理志讀可也，作修身倫理書讀亦可也」。[17]而其來往故舊亦多與當時「新派」格格不入之人，[18]這些都影響了民國以後以「新派」為主流的研究者，將其摒棄在歷史書寫的視角之外，《大中華地理志》受後人關注的情形自然十分有限。

第三，《大中華地理志》以中學教科書體裁寫成，學界有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把近代以來大量出現的教科書列入學術研究的視域，這種情況

14 林傳甲，〈京師街巷記總序〉，收入林傳甲總纂，鄧宇安校閱，《京師街巷記》（北京：武學書館，1919），頁 1；劉文賢，〈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後序〉，收入林傳甲著，楊鐮、張頤青整理，《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據 1919 年 10 月 10 日中國地學會初版重印），頁 275；林傳甲，〈大中華京師地理志自序〉，收入氏著，京師中國地學會編，《大中華京師地理志》（京師：中華印書局，1919），頁 3。林傳甲對新派學生或有一定程度的偏見，事實上，大約同一時期代表「新派」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即開闢「社會調查」欄目，例如：1919 年 12 月的〈長沙社會調查面面觀〉就有人力車夫的生計、中等社的生計、新文化運動、勞農的生計、一般生計的窮困等五篇調查。見《新青年》7 卷 1 期（1919 年 12 月，上海），頁 96-108。

15 清末康有為即已醞釀成立孔教組織，1906 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先成立尊孔學堂。陳煥章則在家鄉創立倡教會，是為孔教會前身，而全國孔教總會成立於 1912 年 10 月 7 日，發起人包括陳煥章、沈曾植、朱祖謀等人。相關研究請參考：范玉秋，《清末民初孔教會運動研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2-137；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70-81、167。

16 林傳甲，〈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3。

17 劉鳳章，〈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序〉，收入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武昌：永盛印刷局，1919），頁 5-6。

18 林傳甲編纂地理志時期，為其作序或是請益、協助的對象中，不乏如陳煥章等孔教會成員，或是具有前清功名並對時下新派人物不滿的學人、中國地學會早期成員，這些人在民國的主流話語中始終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不為後來的主流敘事所重視。柯璜，〈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雖然在最近十來年出現一些變化，不少研究者從知識生產的角度重新檢視教科書，獲致相當不錯的成果，[19]但研究地理教科書者卻多只留心於以「全稱式」的中國為對象，統合敘述的「本國地理」教科書，而不太注意像《大中華地理志》這種採取「以省分編」方式寫成的本國地理教科書，而這也正是《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在晚清民初眾多地理教科書中獨樹一幟之處，惟此特點在當時卻不盡符合教學需要和市場潮流。林傳甲過世後，分省編寫的《大中華地理志》並未完成，無以構成完整的中國地理全貌，願意採用的學校自然不多，久而久之便受人遺忘。

筆者認為《大中華地理志》採取分省書寫的特性，以及林傳甲動員各地中小學生員協助調查，再以一人之力寫就全國的撰寫方式，實為分析近代地理知識轉型時期，地方士人如何處理地方與國家認同問題極好的素材。加以近年來相關史料的重刊，亦給予此研究有利的時機，2010年《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出版，其中收錄厲時中所編寫的《大中華山西省大同縣地理志》，[20]此書為《大中華地理志》縣志系列中的一種，然而由於學界對於《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並不熟悉，因此出版之後

19 相關研究可參看 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 卷 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1-40；沙培德，〈敘事與教誨：教科書中的知識傳遞（1902-1937）〉，收入沙培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231-270；孫江、黃東蘭，〈作為事件的他者——近代中日歷史教科書裡的前近代敘述〉，收入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179-188；並木賴壽、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0）；Peter Zarrow, “The New Scho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May-bo Ching,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s and Gazetteers;” Tze-ki Hon, “Educating the Citizens: Visions of China in Late Qing History Textbooks,” 以上俱收入 Tze-ki Hon, and Robert J. Culp, e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pp. 21-54, 55-77, 79-105. Peter Zarrow, “Discipline and Narrativ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loughney and Zarrow, *Transforming History*, pp. 169-207.

20 厲時中編，《大中華山西省大同縣地理志》（民國 9 年石印本），收入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 15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臺灣大學出版社

並未引起一般人注意。爾後又有出版社陸續將《大中華京兆地理志》[21]和《林傳甲日記》[22]重新整理出版，這些重刊之作或能帶動學界關注《大中華地理志》。基於此，本文在相對缺乏直接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所欲探討的問題包括：在清末民初鄉土志、鄉土教科書熱潮逐漸消退之後，中國地學會成員林傳甲編纂《大中華地理志》的用意何在？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這一系列的地理教科書？而此一系列具有教科書性質的《大中華地理志》和稍早的鄉土志、鄉土教科書及同一時期的地理教科書有何不同？林傳甲想要藉著這套教科書建構什麼樣的地理知識？以及這些描摹家國想像的地理知識背後又寓涵作者什麼樣的地方與國家認同？而此一認同對於重新理解近代知識的轉型、地方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又有那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一、林傳甲與《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

創立於 1909 年（宣統元年）的中國地學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專門從事地理研究的學術團體，發起人張相文（1866-1933）、白眉初（1876-1940）等人，在學會成立第二年（1910 年 2 月）隨即創辦了《地學雜誌》，成為海內外地理學者重要的發表園地。從 1910 年創刊到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地學雜誌》除 1925-1927 兩年因經費不足暫時停刊之外，27 年間共發行 181 期，算是近代中國十分長壽的學術刊物。1916 年，長年在黑龍江從事教育工作的林傳甲來到北京，加入中國地學會。林傳甲祖籍福建閩侯，幼年因父親林文釗出任湖北應山縣典史而在湖北長大。

21 《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出版後至今，僅見整理者自行發表一篇關於此書的評介，但文中多處描述之《大中華地理志》並不正確。徐泳、楊鑲，〈北京人文地理第一書——大中華京兆地理志評介〉，《全國新書目》2013 年第 7 期（北京），頁 52-53。

22 《林傳甲日記》上、下冊包括光緒二十六（1900）年的《篝筆軒讀書日記》和民國元年至民國 3 年（1912-1914）的《黑龍江教育日記》，收入況正兵、解旬靈整理，《林傳甲日記》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6 歲時林傳甲父親過世，由母親劉堃（?-1916）撫養成人，[23] 1902 年回鄉參加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一舉高中解元。自幼因受父祖輩深習輿地之學的影響，即對地理學極感興趣，可說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地理學者。林傳甲早年在黑龍江辦理學務時，已有編寫鄉土志的經驗，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地志缺乏善本，過去一統志或《方輿紀要》一類的地理書，不是太過重視考古，就是偏於用兵，[24]不合今用，因此他在加入中國地學會不久，即正式提案糾集全國地理學者和學校教師、學生，編纂《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

最初林傳甲的構想十分龐大，希望以中國地學會為總機關，糾集「中華全國地理專家」，由中華書局醵資購稿，匯成全書。[25]他將這套書分成甲、乙、丙、丁、戊五編，「甲編志全國，乙編志各省區，丙編志各道，丁編志各縣，戊編志各埠，各名勝、各要塞、各鐵道」，總共 3,000 冊，各自為書，合之為《大中華地理志》。[26]根據最初的構想，甲編以國為對象，在京編輯，中國地學會為編輯機關，由「京師大學校」地理教員主其事，利用京師圖書館內庋藏的千餘部省縣方志，並參考內政、外交、財政、司法、教育等院部最近的調查；乙編的京兆志、丁編的大興縣志、宛平縣志和戊編的北京城志，也都在京師編輯，以「為各省各縣之模範」。[27]也就是說，各省、各縣、各埠全都採用「中華地理全志

23 劉堃，字蜀生，人稱林下老人，是清末民初觀念極為前衛的女性，夫君過世後，獨自撫養林氏兄弟成人，並於晚年興女學於湖南，後又受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之託，擔任奉天女子師範學堂監督，創辦黑龍江省立女子教養院，編有《女子歷史》教科書，並參與《婦女雜誌》、《中華婦女界》的發刊與撰稿。林傳甲，《黑龍江教育日記》，收入況正兵、解旬靈整理，《林傳甲日記》下冊，頁 814。有關劉堃的相關研究，可參考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 176-187。

24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天津），頁 84。（本文引用《地學雜誌》為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重印本）

25 劉仲仁，〈大中華京師地理志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3。

26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頁 83-84。

27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頁 84-8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體裁」，形成從國－省－道－縣－埠一致的體例。

但實際執行之後，林傳甲發現如此龐大的計畫不易推動，所以他先把重心放在力所能及的省志和縣志上，重新規劃甲編為省地理志，乙編為縣地理志，並依當時全國行政區劃，分成 22 省外加京師、京兆、蒙、藏、青海等區，共編 32 冊，以及全國 1,844 縣，每縣各出一書，預定 10 年之內完成此一空前壯舉。修改後的計畫廣受會員支持，同時也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呼應林傳甲所提〈擬編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的縣份多達 400 餘縣，[28]而主動承輯各省縣分志者亦爭先題名，相繼刊錄在《地學雜誌》上。

中國地學會最初將《大中華地理志》編寫計畫委託時任《地學雜誌》編輯的章嶔（1879-1931）和劉仲仁負責，會長張相文希望如此龐大的編撰工程，最好能舉一縣以為範本，其他各志才得仿效。於是當時正在直隸省易縣講學的林傳甲，便動員當地上百名學生協助調查，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完成《易縣地理志》，並分期發表於《地學雜誌》。[29]此後林傳甲以此經驗為藍本，[30]採取相同模式，在四年間陸續出版 13 種地理志，以及《京師街巷記》等書，以下依出版先後次序臚列如下：

《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1918 年 7 月 7 日。

《大中華江蘇省地理志》1918 年 8 月 15 日。

《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1918 年 12 月 23 日。

《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1919 年 6 月 20 日。

---

28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自序〉，收入林傳甲總纂，林懷民校勘，《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地不詳：浙江印刷公司，1918），頁 1。

29 易縣中學初編，林傳甲、連德純著，〈大中華易縣地理志〉，《地學雜誌》1917 年第 5 期（天津），頁 39-41；1917 年第 6、7 期，頁 46-80；1917 年第 8、9 期，頁 19-23；1918 年第 2、3 期，頁 49-66；1918 年第 4、5 期，頁 16-27。

30 根據〈大中華地理志序例〉，縣志當以大興縣、宛平縣為藍本，提供各縣參考，然而這兩縣的地理志卻是在林傳甲完成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北、京師等地理志之後，才在地方士人的協助下出示調查、徵文通告。林傳甲，〈大中華京兆大興縣、宛平縣地理志徵文通告〉，《安徽教育月刊》1919 年第 21 期（安慶），頁 12-1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1919 年 7 月 15 日。
《大中華京師地理志》　1919 年 8 月 8 日。
《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1919 年 10 月 10 日。
《大中華京兆地理志》　1919 年 10 月 10 日。
《大中華山西省地理志》1919 年 12 月（？）。
《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1920 年 1 月 1 日。
《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1920 年 9 月 9 日。
《大中華河南省地理志》1920 年 10 月 10 日。
《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1921 年 12 月 20 日。

根據〈擬編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所載，《大中華地理志》原是以教科書性質規劃的書系，字數、篇幅、體例和撰寫內容有一定的規範，就連寫作對象都已設定：京省區地理志為中學教科及甲種實業學校所用，縣地理志則為高等小學教科之用。[31]

實際操作後，《大中華地理志》的規模雖然大幅縮減，但要完成 32 冊省級地理志和 1,844 冊的縣地理志仍非易事。依林傳甲初期的規劃，可由各省各縣學校的地理教員，或是通志局人員負責推動調查、編輯，最後再以個人之力著述成書。[32]於是林傳甲在寫成《大中華易縣地理志》後，便利用前往山東講學之便，預想以同樣方法編寫山東各縣地理志，為此他動員當地師範學校學生 400 餘人，分任山東 107 縣的地志調查工作，自己也利用課餘時間登泰山、謁孔林、遊青島，遍訪當地名山大川，完成各縣小序。[33]然而在此過程中，林傳甲發現參與學生程度不齊，調查所得未必可用，易縣模式並不盡然適用，山東各縣地理志撰寫計畫只好先行擱置。[34]此時林傳甲的舊識、時任安徽省長的黃雋珊，見林氏在

31 林傳甲，〈大中華京師地理志自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1；林傳甲，〈擬編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天津），頁 97-99。
32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頁 84-85。
33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1。
34 林傳甲，〈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自序〉，收入林傳甲總纂，蘇莘分纂，《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頁 2。

臺灣大學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山東編纂縣志受挫，便勸其前往安徽，改從省志著手。[35]林傳甲接受其建議，因而安徽、浙江、江蘇、江西各省地理志皆分別在三個月內順利完成，[36]山西省地理志甚至只花一個月的時間即刊刻付梓。[37]林傳甲以省志先於縣志的方式突破起步時的困難，他相信待江、浙、皖、贛四省地理志完成之後，再督促省區分纂各縣地理志應該相對容易許多。[38]

從出版時間來看，13 部傳世的《大中華地理志》大約都集中在 1918-1920 年間寫成、出版，最後一冊《吉林省地理志》推遲到 1921 年年底問世，距離林傳甲過世（1922 年元月 26 日）不過一個多月。林傳甲何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並且在民初學界、教育界如此艱難惡劣的環境中，還能籌足資金，用以支付龐大的出版開銷。筆者認為此與林傳甲個人強大的意志力和使命感固然有關，早年家庭教育的養成、林氏家族的支持，及《大中華地理志》高明的出版策略，應該也是不可忽略的要因。

林傳甲對地理知識的興趣來自於父祖輩的啟蒙，據言林傳甲幼年

35 黃隽珊表示：「先編縣志，後編省志，雖根本之計，終勞而無功，不如先編省志，一省成則他省亦易推行，各縣亦有所模範。」林傳甲，〈大中華山東地理志自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2；〈各省紀聞：林傳甲君之地理新著〉，《教育周報》228 期（1918，杭州），頁 8-11。

36 1918 年 1-3 月《安徽省地理志》纂成，4-6 月《浙江省地理志》纂成，7-9 月《江蘇省地理志》成書，10-12 月《江西省地理志》成，編纂過程皆不超過 3 個月。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第三年報告〉，收入林傳甲總纂，林傳濤校勘，《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南昌：裕成印刷公司，1918），頁 1。

37 林傳濤，〈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後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1。

38 例如安徽第一師範完成縣鄉土志 200 餘冊，浙江省則由省教育會長經亨頤督促寫成分纂凡例；江蘇省更有教育家黃任之、沈信卿與地理學家姚孟塤、童季通響應，第二師範賈季英、第三師範錢基博等，力促學生從事鄉土調查和分縣編纂的工作；江西省則由南昌高等小學負責，讓學生利用寒假回縣調查分纂縣志。雖然這些縣地理志最後不見得出版，但省地理志的完成，顯然對林傳甲推動縣級地理志的書寫工作有直接幫助。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第三年報告〉，《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頁 2；林傳甲，〈大中華江蘇省地理志序例〉，收入氏著，《大中華江蘇省地理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頁 3-4。

臺灣大學圖書館

時，父祖便以家中所藏林則徐《畿輔水利議》及《滇軺紀程》，教授未識之無的林傳甲。父親過世後，林傳甲隨身攜帶父親留下的《大清一統輿圖》，於所到之處密密記註各地山川形勢。[39]其後，在母親嚴格的教導下，林傳甲很早就接觸到新式教育，對於經史、天算、輿地之學皆有涉獵，弱冠之年即承母命於武昌創立湖北時務學堂，1897 年以後又陸續創辦衡州府與常寧縣時務學堂，四處講授新學，其間還深入湖南猺洞苗疆講學。[40]戊戌以後為湖南學使吳樹梅、柯劭忞延攬入幕，襄校試卷。清末鄉土志風潮大起時，林傳甲即編有《黑龍江鄉土志》（圖一），[41]後又為缺乏地方志書的內蒙編寫《察哈爾鄉土志》。[42] 1904 年嚴復（1854-1921）因見林著《圖史通義》之作，推薦他到京師大學堂任教，教授中國文學史並兼任中國地理預科教習，其後又於出任廣西知縣期間赴日考察。1905 年奉調至黑龍江辦理學務，前後長達十年，對黑龍江教育多所貢獻，1916 年林下老人去世，林傳甲重回津京，全力投入《大中華地理志》的編寫工作。

---

39 林傳甲成人後不能或忘父親遺訓，謂胡林翼（1812-1861）《大清一統輿圖》為「吾子孫百世第一宗財產」。其母林下老人亦曾手抄《閾里文獻考》，訓勉林氏不忘鄉里，並督促林傳甲寫成〈福海歸程〉，記述鄉土狀況。林傳甲，〈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頁 1；〈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1。

40 馬毓京，〈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3-14。

41 目前只知林傳甲在宣統年間編寫《黑龍江鄉土志》，確切時間無法察考。林傳甲於 1905-1915 年間在黑龍江辦理學務，惟其所撰《籌筆軒讀書日記》（1900 年元月至 12 月）和《黑龍江教育日記》（1912 年元月至 1914 年 12 月）正好跳過可能寫作的時間而沒有記載。筆者所見《黑龍江鄉土志》版本，有林傳甲所作〈凡例〉及劉塏序言，另有《龍江學報》和林傳甲親撰的《鐵路教科書》（80 課）附錄其後。林傳甲，《黑龍江鄉土志》，宣統年間刻本八冊（出版項不詳）。

42 林傳甲於 1916 年由黑龍江回到津京之前，曾前往內蒙古，於張北縣創立一所師範學校，並於綏遠豐鎮縣設立商校一所，而《察哈爾鄉土志》即為當時教科所編。馬毓京，〈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3；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最早刊於《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詳註 63），後另出單行本。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圖一 林傳甲，《黑龍江鄉土志》「地理篇」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志庫」。

林傳甲一生短短 45 年，對於教育工作始終抱持著極大熱情，自 1916 年立志編寫《大中華地理志》以來，以絕大的毅力上山下海實地調查，並日日埋首書堆，抱持著「中國人之中國，宜自中國人知中國為始」的理念編寫地志。[43]大凡認識他的朋友、師長，對於他幾乎以性命投入地理志的撰寫工作，都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地學雜誌》早年編輯劉仲仁回憶：《大中華地理志》編寫以前，坊間本有撰寫《中華地理全誌》的構想，及至日本《支那省別全誌》出版，便有人建議可以其為底本翻譯刊行，然而林傳甲和劉仲仁等中國地學會成員深以為恥，認為介紹自己國家的地理書實不宜假借日人之手，才於 1916 年 5 月向張相文建議纂修《大中華地理志》。唯原先承諾出版的中華書局，卻於此時因公司虧損，撤回購稿之議，出版計畫橫生周折；而原先響應承纂分志之人，

43 劉仲仁，〈大中華京師地理志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真正著手計畫後，也深感不易為之而紛紛打退堂鼓，只有林傳甲不肯輕易放棄，在寫出《大中華易縣地理志》之後，還願意承擔所有未成省志的編輯工作。[44]林傳甲年少時在湖北結識的總角至交鄧鼓翔，形容林傳甲「閉戶則食墨三升，出門則挾書一部，侵（清？）晨即起，嚮晚方歸」，四處奔波、遍行 15 省，短短幾年間，從翩翩少年一變而成「傴僂長髯」的老人，[45]而此時林傳甲不過 42 歲。再過 3 年，林傳甲重回東北，完成最後一部《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便與世長辭，壯志未酬，留下的未竟之業，後人亦難再續。[46]

編寫鄉土教材的經驗，對於林傳甲編寫《大中華地理志》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唯此大部頭著作的規模和範圍，又非當年初小鄉土教科書可以相提並論。家境並不富裕的林傳甲，究竟如何做到一省接著一省，3 個月完成一部《大中華地理志》？對此，林傳甲有其一套特別的作法。

他認為各省縣志的書寫必須由在地人集體合作方有以致之，他強調「全省之人，共研全省地理，全國之人，共研全國地理」，才無愧為「共和國教科書」。林傳甲堅持在他編纂地理志期間不設機關，不掛招牌，不聘人員，也不定預算；他認為歷來通志局、縣志局，虛糜廩粟，曠日無成，[47]所以從他撰寫《易縣地理志》開始，每到一處，必定拜訪當地要員或全國教育聯合會、中國地學會成員，請其協助動員該地中小學或師範學校師生，利用課餘時間及寒暑假回鄉進行實地調查。以《安徽省地理志》為例，林傳甲聽從黃雋珊建議前往安徽以後，隨即動員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生進行鄉土調查，集成 208 冊調查書；而一時之間未能完

44 劉仲仁，〈大中華京師地理志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3。

45 鄧鼓翔，〈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鄧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5-7。

46 林傳甲過世前，仍在編寫《大中華陝西省地理志》，由黃昌壽擔任分纂，《湖南省地理志》由分纂龍承燨進行地質調查，《察哈爾地理志》由分纂錢栻時調查鄉土，《綏遠地理志》由分纂劉仲仁進行調查。而弟弟林傳台也協助編寫《黑龍江省地理志》，但這些分冊在林傳甲過世後都未見出版。林傳甲，〈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凡例〉，《大中華京兆地理志》，頁 15-16。

47 林傳甲，〈大中華京兆地理志自序〉，《大中華京兆地理志》，頁 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集

成調查的地方，則函請第二、三、四、五各師範學校及中學農工學校學生於寒假期間補充。與此同時，他自己也在安徽當地勤訪地方議員、教職員工，並且覆勘各縣志書及清季各縣鄉土志，以舊志與現況比對，遇有差異隨時修改，務求「字字必有根據」。[48]除此之外，林傳甲很堅持親身遊歷考察的重要性，就連曾經待過 10 年的黑龍江，也在他重返東北之後一一重勘。[49]如分身乏術，必須趕赴他省調查時，萬不得已則委託堂弟林傳濤或在地人擔任分纂，補強未完的工作。[50]

書成後，林傳甲以《大中華地理志》之名向內務部註冊登記著作權，並為解決所費不貲的出版費用，與出版商約訂，出書前先付預約款，印刷完成後依約出版，如有餘利，林傳甲便用以支應後續他省調查、撰稿費用。而書商可在印刷期間開放學校預訂，預約訂書者享定價 2 元減半優惠，[51]如此書商可確保收益。這樣的作法可能一開始比較困難，但前面幾冊如期出版後，出版商對林傳甲的寫作進度和預售狀況產生信心，自然比較願意支付預約寫作款項，聲譽建立之後，各省動員學校配合從事鄉土調查的意願也隨之增加。只是一般會預約訂書的學校大多位在省會或大城市，偏僻小縣不見得知道，因此如果有機會，林傳甲必先行拜訪督軍、省長、省教育廳或鄉賢故舊，請其提倡並代為分銷。[52]《吉林

48 林傳甲，〈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凡例〉，收入氏著，黃昌壽校刊，《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北京：中國地學會，1919），頁 2-3。

49 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出版之宣言〉，收入氏著，《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北京：中國地學會，1921），頁 1。

50 林傳甲雖為福建人，但一生在閩時間不超過 3 個月，因此他未完成所有調查報告即須離閩之際，即委託堂弟林傳濤代行其事，後來林傳濤多方協助堂兄，擔任山西省、山東省分纂，以及校勘湖北省地理志。而直隸省亦有中國地學會的蘇莘，湖北省有在地人阮麟運擔任分纂。林傳濤，〈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後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1。

51 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出版之宣言〉，《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頁 2。

52 《大中華京兆地理志》由人稱王大京兆的京兆尹王達（1881-1946）通飭各縣分銷，於是大興縣有小學 110 處訂購 110 冊，宛平縣有小學 160 處訂購 160 冊。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3；〈大中華京兆地理志自序〉，《大中華京兆地理志》，頁 11。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藏

省地理志》出版前，林傳甲就曾自己攜帶已經出版的京師、京兆、直隸、河南、安徽等地理志各 20 冊，請吉林省教育廳頒發各校傳觀以為宣傳。其中山西省的情況最好，預約購書期就銷售了 2,000 冊，毫無拖欠，林傳甲以此筆餘款，還清湖北欠款，還可遷眷入京。[53]林傳甲撰寫《大中華地理志》時，無不以寫作地志為重，病逝前不久還計畫完成東三省地志之後，前往西北、西南各省調查，其自稱「浮家泛宅，以大中華為家」，確非虛言。[54]若非天不假年，林傳甲以 10 年時間完成全國地志之宏願抑或可期。

二、從微分到積分，從地方到國家

在林傳甲的觀念裡，《天下郡國利病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等地理書簡冊繁重，只能合而觀之，而各省通志和府廳州縣志又往往各自為書，詳略不一，所以《大中華地理志》自規劃之初既為改正傳統地理書的缺點，也為學堂教科之便，即採取統一體例、各冊分編的方式，使各冊之間既可分亦可合，「分之既便本省本道本縣之分銷，合之可備各圖書館各學校之參考」。[55]林傳甲所謂「可分可合」的概念，點出《大中華地理志》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使其不同於一般地理教科書多以「國」為成書對象，而是採取集各縣以成一省，集各省以成一國的方式，成就一套「可分可合」的中國地理教科書，分之可為一地之志，合之則成全國地理書。

事實上，自清末地理教科書出現以來，除了具有鄉土志性質的鄉土地理教科書之外，多數的中國地理教科書都以國家為單位，例如 20 世紀初張相文編寫的《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首先通論全球性的天文地理、

53 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3-4。
54 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出版之宣言〉，《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頁 2。
55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頁 84。

臺灣大學出版術期刊資料庫

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各章，再從亞洲切入，綜論中國的位置、境界、區劃、天氣、地勢、民族、宗教、產業和山、河、湖、海等地文地理，以及邊防、交通等項，最後才分章介紹各省區劃、重要都會及物產。[56]該書為國人自編地理教科書的首例，極具示範意義，後來的中國地理教科書莫不仿其體例，例如屠寄的《中國地理教科書》，一樣在亞細亞洲總論、中國總論之後，才接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和分省方志。[57]換言之，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地理教科書多以中國全境為書寫單位，分從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綜述中國地理全貌，再以章為別，分述各省。在此體例下，讀者雖然比較容易掌握中國地理的全貌，卻不容易看出作者如何看待地方和國家的關係，而書寫各省的地方志往往也因篇幅所囿，只能簡單敘述該省位置、地勢、都會或重要物產。

質言之，《大中華地理志》雖名之為地理教科書，卻有著地方志和鄉土志的特性，林傳甲希望這套書「可分可合」的構想，顯然除了便於各省各縣教學考量，也還有合地方以成國家的用意，因此《大中華地理志》最初才會設想以縣為起點，由縣到省，由省到國。只是 1,844 個縣同時起步，事涉太廣，不論是林傳甲個人或集中國地學會之力，皆無以為之，遂採折衷辦法，從中段的省地理志做起，但林傳甲還是秉持著由縣到省，再擴及國家的概念。其摯友鄧鼓翔便清楚地衍義了林傳甲之意，他說：

> 余知林子未第時，在鄂即刊《代微積淺釋》，為時務學堂課本，今大學生猶讀其《微積集證》，謂前古疇人所未發。不惟湘鄂人士，

56 張相文的《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為三卷本，外加附圖一卷，據言最早由蘭陵社出版，初版年份根據《泗陽張沛谷居士年譜》記載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該年同時出版的尚有《初等地理教科書》，後改名為《蒙學地理教科書》，年譜謂此二書為「中國有地理教科書之嚆矢」。筆者所見為 1903 年增訂的南洋公學編譯本。張星烺述，《泗陽張沛谷居士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頁 18-19；張相文，《增訂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南洋公學編譯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5 月第二次印行）。

57 屠寄，《中國地理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版，宣統三年〔1911〕11 版）。

臺灣人文學會版權所有

> 震其步算之名，余既欽林子學業之博，又深知林子不因境遇而改其初志也。常云：《京師志》、各省縣志，皆微分也，《大中華地理志》，其積分也；《京師志》，其微分之求積分者乎？[58]

鄧鼓翔以林傳甲早年所作《微積集證》中微分、積分之論比喻省與國的關係，認為國是省累加而得的積分，而省之於國則是細小的微分，作各省地理志實是以微分求積分。

在林傳甲的觀念裡，這套由微分到積分，由地方到國家的地理想像，是可以透過一套極為接近的書寫框架來達成。13 省地理志，每冊一律 160 章，編者設定講者每星期講授一章，4 年講授完畢，其內容包括：總論、位置、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和地方志等篇。[59]有些省地理志即使無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之名，各章所述內容基本上並無不同。[60]例如位置篇必有該省經緯度，東西南北四界經緯；地文地理描述該省的自然地理，如水陸形勢、山脈、海灣、河流、海岸、島嶼、湖泊、風向、雨雪量、氣候、地質、地震、礦物、植物和動物等；人文地理則包括各省的戶口、民族、言語、衣服、飲食、居處、器用、宗教、節序、風俗、婚喪、省議會、各級行政官制、縣行政、軍務軍備、警察、財政、稅關、鹽場、司法、教育、農業、工業、商業、名勝、鐵路、電政、郵政等；最後則是該省所含括的縣份，即所謂地方志。

表面上，《大中華地理志》和其他中國地理教科書一樣包含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和地方志等三個部分，唯其以「微分到積分，地方到國家」的理念分省書寫，因而具有「志地方以成國家」的特質。筆者認為林傳甲這一思路，一方面受到清末以來鄉土志、鄉土教科書編寫風潮的影響，二則應與稍早日本出版的《支那省別全誌》有關。

1904 年《奏定初等小學堂》頒布，於歷史、地理、格致（包括物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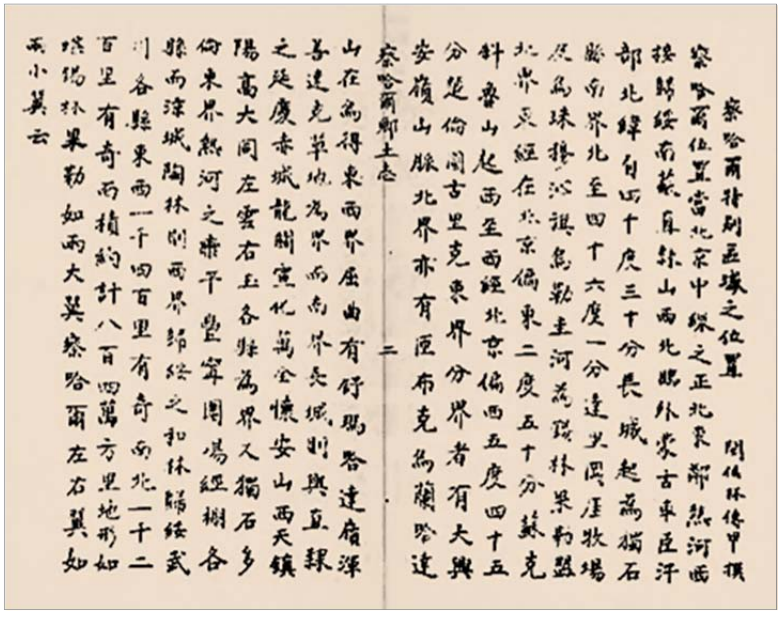
58 鄧鼓翔，〈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鄧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6-7。

59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1。

60 林傳甲，〈擬編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頁 97-9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商務）等三科均特別強調宜先講與鄉土有關係者，方能由近及遠，養成其愛鄉土之心。[61]為此，朝廷開始大力提倡鄉土教育，希望各府廳州縣都能自撰鄉土志以為授課之用，[62]《黑龍江鄉土志》便是林傳甲在黑龍江辦理學務時響應此風潮的產物。唯不久之後，歷史、地理、格致三科有關鄉土教材的內容併入國文課，編寫鄉土教科書熱潮漸漸消退。民國以後林傳甲於察哈爾講學之際，有見於當地無舊志可用，便以調查為本，新編《察哈爾鄉土志》以為師範學校之用（圖二）。[63]



圖二　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油印本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志庫」。

61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 295-296。

62 〈學務處咨各省督撫編輯鄉土志文〉，《教育雜誌》第 7 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4 月，天津），頁 11；學部，〈鄉土志例目〉，夏雲程纂，《銅梁縣鄉土志》，收入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輯，《鄉土志抄稿本選編》（北京：線裝書局，2002），第 11 冊，頁 309-310。

63 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天津），頁 31。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有意思的是，這本《察哈爾鄉土志》雖名為「鄉土志」，卻和早年以歷史、地理、格致分編的體例不同，由其細目觀之，[64]反而更像鄉土地理教科書，若與《大中華地理志》對照，即可清楚看出二者在類目和體例上的重合之處。事實上，《察哈爾鄉土志》發表的時間和林傳甲在中國地學會號召糾集全國之力編纂《大中華地理志》的時間十分接近，我們甚至可以說林傳甲原則上就是以《察哈爾鄉土志》為藍本來構思《大中華地理志》的，而《大中華地理志》從微分到積分、集地方以成國家的概念，以及「可分可合」的構想，亦可說是鄉土志、鄉土教科書「愛國必自愛鄉始」的延伸。

其次，林傳甲在多部《大中華地理志》中經常提及他因愛國與激憤而作此志，他坦承最早著手的《山東省地理志》（圖三），是所有省份中實地調查最久也最詳細的一省。調查過程中，林傳甲深深感受到外患紛迫，華僑出洋墾殖者極多，他在膠濟鐵路沿線來回走了 15 次，深切感受外人刺激，「自然發為愛國之音」。[65]

事實上，早在 1900 年林傳甲還在京師大學堂任教時，親見服部宇之吉（1867-1939）協助日本清國駐屯軍司令部於數月間作成《北京誌》，[66]其激憤之情已然萌現，並悄悄埋下日後寫作地志之因由。及至撰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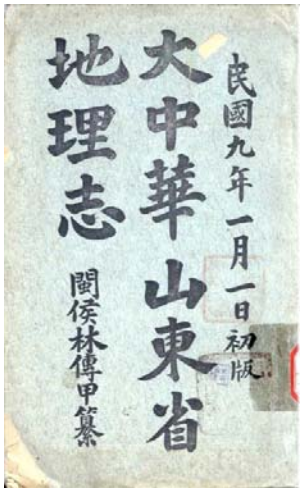
64 《察哈爾鄉土志》的內容包括：位置、山脈、河流、湖泊、沙漠、井泉、長城、氣候、地勢、礦產、農產、植物、動物、製造，以及人種、言語、衣服、飲食、居處、器用、宗教、節序、家族、禮俗、政區、道制、縣制、警察、蒙盟、察防、牧廠、臺站、財政、司法、教育、蒙文、文化、農墾、商場、貨幣、娛樂場、鐵路、道路、橋樑、電信、郵政等項。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頁 31-39；1916 年第 8 期，頁 17-39；1916 年第 9 期，頁 24-30；1916 年第 11 期，頁 6-10；1916 年第 12 期，頁 11-15。

65 林傳甲，〈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1、3。

66 林傳甲指《北京誌》為服部宇之吉所作，實際上服部只負責撰寫《北京誌》中的制度史。清國駐屯軍司令部，《北京誌》（東京：大橋新太郎，1908）；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2；林傳甲，〈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2。

臺灣大學藝術學期刊資料庫

中華地理志》前後，適值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將每年在中國內地各省及內蒙等地的調查報告，整理成《支那省別全誌》（圖四）出版，[67]林傳甲更是備受刺激，認為日人以旅行為名，對中國政治、經濟、地理等現狀展開極為細密的調查是別有用心的。





左圖三　林傳甲《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縮微文獻閱覽室藏。

右圖四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卷四「山東省」
圖片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67 東亞同文會接受日本外務省資助，1898 年在東京成立本部，並於北京、上海、漢口、福州、廣州設立支部，1900 年成立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以研究中國現狀為主，學生畢業之前，到中國各地旅行，有計畫地收集政治、經濟、地理等資料，寫成調查報告及旅行日記，提供日本政府參考。《支那省別全誌》即根據明治 40 年至大正 4 年（1907-1915）學生調查報告書寫成，總共 18 冊。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1920；本文採用南天書局 1988 年影印本《中國省別全誌》）。1990 年後日本和中國陸續整理出版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調查資料，如：雄松堂編，《東亜同文書院中国調査旅行報告書》（原題《支那調查報告書》）（東京：雄松堂，1996）；馮天瑜、劉柏林等編，李少軍等譯，《東亞同文書院中　國調查資料選譯》1-3 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相關研究可參考：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中国大調查旅行の研究》（東京：大明堂，2000）。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資料室

林傳甲表示：「日本調查吾國，所編《支那省別地（全）志》，乃次第出版，傳甲實為國人恥之。」[68]他尤其痛恨日本人稱我為「支那」，他說：「大中華行將裂為南支北支，蓋東鄰著述不稱我為中華，而謂之曰支那，無識之留學生，亦盲從焉，支分支解之禍，皆根於政客偉人，不愛國家，不顧地方，鑄此大錯也」。[69]面對強鄰逼迫，中國內部不靖，南北分裂，林傳甲認為只能從地方自治做起，即所謂「合諸縣為一省，合諸省為一國」，全國統一方才可期，根本之道就是透過地理教科書，讓所有中國人和下一代認識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國家。

不過話說回來，林傳甲儘管對東亞同文書院調查中國的行徑不以為然，筆者認為《支那省別全誌》的編寫體例和方法還是對林傳甲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最明顯之處莫過於《支那省別全誌》為了解現狀所採取的調查方法，以及以分省書寫的方式深入地方。東亞同文會幹事長小川平吉（1870-1942）曾經表示：中國自古以來的地理書，從《禹貢》、《水經》到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以至於《太平寰宇記》、《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等近世以前的著述雖然極為完備，但有關現在形勢的紀錄卻相對匱乏，[70]同樣的意思也不斷出現在林傳甲為《大中華地理志》各冊所寫的序言裡。換言之，從《易縣地理志》和《京師街巷記》開始，林傳甲念茲在茲的就是動員各地生員從事地方調查，他自己亦上山下海，時時記錄實地景況與舊志之間的差別。而各省《大中華地理志》的〈引用書目〉亦絕少不列入《支那省別全誌》，其影響力可見一斑。此外，在分省書寫方面，《支那省別全誌》前後動員上千人，根據 20 萬頁的調查稿本寫成，[71]其內容包括廣東、廣西、雲南、山東、四川、甘

68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啟事〉，《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4。

69 林傳甲，〈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自序〉，收入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京師：中國地學會，1919），頁 12。

70 小川平吉，〈支那省別全誌序〉，收入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南天書局影印本《中國省別全誌》），頁 3。

71 小川平吉，〈支那省別全誌序〉、根津一，〈支那省別全誌序〉，收入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南天書局影印本《中國省別全誌》），頁 1-4、8。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肅（附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蘇、貴州、山西、直隸等 18 省。這種以省為別，且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大部頭地理書，不可能不對林傳甲及中國地學會成員造成衝擊。對照中國當時大多數的地理教科書仍以國家為單位，或以翻譯、傳抄東西洋著作為底本，林傳甲有意從地方出發，配合實地調查，把《大中華地理志》寫成一套中國人自著的地理書，未始沒有和《支那省別全誌》一別苗頭的意味。

《大中華地理志》「從微分以求積分」的概念，某種程度上好比梁啟超等晚清士人引介國家主義觀念時，強調國家由國民組成，國民才是形構國家的基礎；從搏成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角度來看，梁啟超從國家組成分子出發，著意的是國民，而林傳甲從地理想像出發，著意的是鄉土，因此地理空間的區辨便為《大中華地理志》有別於鄉土志——甚至傳統方志最大的不同處。首部出版的《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凡例〉，林傳甲就表明：

> 本編專以地理為界，此外擬編《浙江鄉賢傳》，為修身教科，《浙江文學史》，為國文教科，《浙江博物志》，為博物教科，《浙江名勝畫》，為圖畫教科，《浙江唱歌集》，為音樂教科，《浙江列女傳》，為女學教科，《浙江蠶桑圖》，為家政蠶業模範。願浙江鴻碩，共編成《浙江百科全書》。[72]

由於傳統方志和清末以來的鄉土志往往比地理教科書更著重地方或鄉土的各方各面，因此林傳甲希望《大中華地理志》能夠更聚焦於地理方面的論述，對於原本在方志或鄉土志中必然載記的一地之鄉賢、文學、博物、名勝、列女等等都應該另成他作，最後再總成一套地方「百科全書」，以便學生在不同的學科當中，也能認識家鄉的地方特色。此一觀念透露出《大中華地理志》「合地方以成國家」的概念固然受到鄉土志、鄉土教科書的影響，但在書寫內容上，林傳甲卻有意將地理志和方志或鄉土

72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志區隔開來，嘗試以現代學術分科的概念重新組構地方知識，唯其如此，這些分科表述的地方知識才能成為搏成現代民族國家的知識來源。

在林傳甲的策畫下，《大中華地理志》剔除了非地理學教科的內容，並特意改變傳統方志和鄉土教科書中「詳於人物，疎於地質」的寫法。像是《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林傳甲原擬依據 1877（光緒三）年所編的《安徽通志》起草，但他認為 40 餘年前的方志「未列經緯，且有山無脈，水道亦散見各府州，不相聯屬」，而這 40 來年，政局大變，舊志僅能提供考證疆域沿革之用。[73]身為中國地學會成員，林傳甲在寫作地志時充分表露中國地學會組織成立時的宗旨和觀察視角，希望以現代地理學更為精確的方法和地理資料，重寫過去方志對地理方位和自然景觀籠統且模稜兩可的記載。因此林傳甲在各省《大中華地理志》〈凡例〉中，一再強調「一切參考書籍，務取現今最適用者」，位置、天文、地理必遵照教育部中央觀象臺曆書及各省農校農場觀測所得；地圖方面除根據胡林翼所繪《大清一統輿圖》外，亦參考各省各縣新繪地圖；[74]風向、雨雪、溫度必有明確數值；地質岩層亦多分區條列。此外，《大中華地理志》亦秉持中國地學會一貫研究地文地理的視角，從實用主義出發，寫山脈必重林礦，談水利則述航運和隄防疏導，論物產則以「民生為本」，動物、植物、礦物等章無書不論，在在強調「自然地理，皆有自然之利」。[75]

地文地理如此，人文地理亦然，《大中華地理志》所述之人文地理無不側重農、工、商業之調查，以及攸關各省實業開發之交通建設，如鐵路、輪船、電政、郵政等。編寫者在描述各省經濟活動之餘，竭盡可能將地方實業建設的成果，以及富藏於地方的物產、資源，廣佈於國民，以為直觀教授之資料，[76]並時時藉著實地考察現狀所得，說明列強侵略

73 林傳甲，〈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頁 1。
74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2。
75 林傳甲，〈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
76 林傳甲，〈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

臺灣大學出版期刊資料庫

對地方造成的危害。如《山東省地理志》〈農業〉一章，編者介紹該省農地因地質情況不同而有腴瘠之別，黃河淤積之沙洲只能種植落花生，沿河一帶甚至因潰決而毫無灌溉之利，農產普遍不足食用。編者強調在此情況下，日人仍於其所到之處掠奪民食，利用鐵路運糧出口，造成民生重困。此外，林傳甲還將實地走訪山東高沂一帶的經驗和日人所編《支那省別全誌》加以比對，發現日人調查有意忽略蘭陵鎮一帶水田，而專重農業產值較高的區域，為此他提醒讀者注意日人調查旨在「奪我大宗民食」。[77]編者於介紹農產之餘，不忘帶進民族主義的視角，讓讀者在認識自己家鄉的同時，也能意識到地方與國家的危難。

在政治地理方面，除了取材於《政府公報》、《教育公報》、《農商公報》、《財政月刊》、各省官書報告、地方報紙，以及各省議會議決案、預算書等信而可徵的材料之外，在書寫體例上亦摒棄傳統方志從地方行政中樞向外觀覽的視角，將民意機關如省議會列之於前，再述省、道、縣之官制，以及軍備、警察、司法、教育等機關。述及地方人民生活時，也一改過去方志和鄉土志重視鄉賢、耆舊、烈女等人物描寫的慣例，改以衣服、飲食、居處、器用、宗教和風俗等庶民生活百態取而代之。以清末學部頒行的〈鄉土志例目〉為例，必將有政績的官員、地方鄉賢、名儒、功臣、名將、循吏、忠節等人物列為重要書寫對象，[78]目的在使本鄉後學在感動之餘，忻啟效尤之情，進而教化鄉里，但在《大中華地理志》裡，個別人物的記載一概為群體活動的總相所取代。如《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如此描述京兆地區人們的飲食：

> 京兆人民食雜糧者，十之七八。……且不但貧民食雜糧，即中等以上，小康人家，亦無不食雜糧。雜糧以玉蜀黍為最多，俗名玉米，鄉人食量，比京師富貴人或加一倍。然平均食料，每人每餐麵一斤，而鄉下自耕自食，計價每人每月所食之價值，不足五角，生活程度，

77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91-92。

78 學部，〈鄉土志例目〉，夏雲程纂，《銅梁縣鄉土志》，頁 315-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幾於人畜平等。貧民小戶，終歲不食香油。[79]

述〈衛生〉一章則說：

> 京兆各縣，山野之民，多得天然衛生之力。西山空氣之澄鮮，湯山溫泉之暖適，凡碧眼虬鬚之遠客，羨之如天堂。……龍鬚溝流其濁，糞場揚其臭，士大夫掩鼻欲嘔，憚之如地獄者，附近居民久居而不聞，老者康健，幼者嬉戲，苟令西人寶貴者居之，不畏病之傳染耶？[80]

編者親赴京兆附近調查，對於貧民、富戶，城居、鄉人的飲食習慣多所描述，同時比對北京西郊風景區與城南龍鬚溝之衛生環境，凸顯京兆人民生活天差地別的實況。在這些篇章中，編者鉅細靡遺羅列京兆人民日常食用的綠豆粥、炸醬麵、餑餑、奶酪等食物，以及京師一帶著名藥品，如同仁堂的虎骨熊油膏、濟生堂的小兒定瘋丹等著名良藥，使本境之人讀來容易產生親切與認同感，外地人讀之亦彷彿親睹京兆庶民生活百態。而《京師地理志》裡更有一般方志和鄉土志裡完全不會、也不能書寫的女閭（妓女）、女僕、接生婆、梨園子弟、乞丐、清道夫和耍雜戲、唱大鼓的演員，以及檢溝貨賺取蠅頭小利的貧民，[81]這些人物既不以個別形象的方式被書寫，更不是鄉土志和傳統方志裡足為後學「感動效尤」的對象。《大中華地理志》有意脫離載記耆舊人物的書寫框架，透露出知識轉型期的地志漸漸脫離傳統方志「觀民設教，體國經野」的教化意圖，也說明近代民權意識大興之後，人文地理的書寫更向人民群體的生息面貌靠攏，單一、特殊、表率型的人物已逐漸淡出。

79 林傳甲著，楊鑲、張頤青整理，《大中華京兆地理志》，頁 120-122。
80 林傳甲著，楊鑲、張頤青整理，《大中華京兆地理志》，頁 126-128。
81 林傳甲著，京師中國地學會編輯，《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99-102、107-108。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三、有國無家？——地方與國家認同

林傳甲以 4 年不到的時間遍行 15 省，以過人的毅力與久積的才學寫成 13 冊《大中華地理志》，書中流露的鄉土之情和愛國之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為每一冊《大中華地理志》作序的在地人亦無不稱頌林傳甲比本省人還要了解本省，[82]對有心寫完全國地志而走訪名山大川、四處問學載錄鄉里的學人來說，這應該是再好不過的讚辭。然而此一時期正值帝國崩解，民國肇建，新的地方和國家關係有待重新釐定，這套以全國地理為書寫對象的分省地理志，畢竟和前此所有方志或鄉土志各有纂輯人的情況不同，林傳甲破天荒地試圖以一人之力寫就全國，必然會遭遇到如何看待地方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大中華地理志》如何處理地方和國家認同的問題。特別是此為學校教科所用的專書，即不論其背後所欲傳達的教育宗旨，也應釐清此一套書所折射的家國想像究竟為何。

1910 年《地學雜誌》創刊號上，有這樣一段話：

> 人生緣大地以為食息，聚國族以謀生存，而天演劇烈，勢不能各守封疆，無相侵奪。則每每員輿，實與民族為消長，日闢百里，日廑百里，固隨其人之自取，然溯厥由來，亦惟地理上之知識優劣不齊，其影響遂被於國家，其禍端並延於種族，此亦物競天擇之公例矣。近世以來，持帝國主義者，類能浮海闢新地，以蕃殖其種族；而我國地大物博，坐資強敵。外交失敗，邊事日亟，雖欲盡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猶不可得。[83]

作者認為在天演劇烈的年代，每個民族的勢力是消是長，能開疆闢地或侷促一隅，所憑藉的完全是地理知識的優劣。而今中國人因地理知識不

82 時任江西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的胡薰（1883-1945）即說：「薰贛人也，於贛事猶未盡悉，先生以異省人，而舉重若輕如是，何其神也。」胡薰，〈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序〉，《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頁 1。

83 〈中國地學會啟〉，《地學雜誌》1910 年第 1 期（天津），頁 1。

臺灣大學歷史學術期刊資料庫

足，無法像西方各國藉實地探測所得「以資生利用」，而「幅員遼闊」又是造成調查困難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國地學會成員抱持因民族憂患而起的自覺，希望集結眾人之力對廣闊的幅員展開分工調查，1916 年林傳甲提議編修的《大中華地理志》正是此一觀念的延續，希望地方調查能從縣到省，從省到國，由小及大，即所謂「合一縣之人，成一縣之志，合一省之人，成一省之志，實合一國之人，成一國之志也」。[84]

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地學會和林傳甲對地理知識強烈的警覺與渴求，主要來自列強侵略所形成的國亡種滅之憂，因此對「國家」的疆域、領土、主權，以及「民生之消長，物產之盈虛」的認識，[85]才是他們從事地理分工調查最終極的目標。儘管林傳甲在提議編寫《大中華地理志》時，預想了從縣出發，然後由小而大，由地方而國家，把對於國家地理知識的認知建立在無數小分子的集結上，亦即「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概念，[86]加以清末以來的鄉土史教育也滋養「由愛鄉而愛國」的觀念；民初政局擾攘，統一遙遙無期，地方自治的風潮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從地方到國家」這條路相對可期的看法。但筆者認為由地方而國家的思維，仍然清楚透露出「國家」才是這整套認識論的核心與終點，以下將根據《大中華地理志》部分內容說明之。

首先，筆者認為林傳甲將各省《大中華地理志》放在一個頗為均質化的書寫框架下，讓各省地理志從形式到內容看來非常周整。如前所述，林傳甲在編纂之初，即為每一冊省、縣地理志製定了基本上相同的體例和架構，從總論、位置，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方志等各篇，視此為各省縣地理志之「公式」。[87]在這個框架下，每一省的調查項目有定例可依循，每省篇幅相同，甚至連內容也很難看出孰輕孰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在不同省份中填入極為近似的觀念和視角。例如《京師

84 林傳甲，〈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頁 1。
85 〈地學雜誌敘例〉，《地學雜誌》1910 年第 1 期，頁 1。
86 林傳甲，〈大中華京師地理志自序〉，《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1。
87 林傳甲，〈編輯浙江七十五縣地理志凡例〉，《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1。

臺灣大學博物館期刊資料庫

地理志》〈戶口〉一章，編者根據《大清一統志》記錄清乾隆時期京師人口僅 170,000 人，至民國八年增至 932,540 人，若加上紫禁城使館四郊之八旗貧民，應有百萬之多。編者認為京師戶口發達，乃生與聚兩大因素使然，人民能夠吃苦耐勞也是重要原因。在談到「生」所造成戶口發達的原因時，編者認為中國人求子心切，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京師各處寺廟道觀多有求子之處。這本是一種人文地理景觀的描寫，但編者在此忽然話鋒一轉：

> 家族制度嚴，父慈子孝，數千年習慣，不容以新說破裂，舊俗雖有早婚不自由諸弊，新說之自由戀愛及避妊墮胎，為禍尤烈，殆未來之洪水猛獸也。[88]

京師人口從十數萬增加到百萬，如果說是因為中國人望子心切使然，那麼其他所有人口眾多的省份似乎也可一體適用；至於自由戀愛、避孕墮胎所帶來的後患並非不可批判，但這些批判同樣也是一套從「新說舊俗對立」的單一價值標準出發的視角，適用於京師，其他地方未必不能合用；而現實中包含各種地理條件所致成更為複雜的人口遷徙流動現象，以及因著這些人口流動所造就的地方特性，反而不易在這樣均質化的視角中呈現。

其他像是描寫京師一帶工師授徒制度時，編者表示師徒相授講求熟能生巧，經驗優於學識，但容易落入「習慣相承的條規」和「不成文的憲法」之中，如果能夠「濟之以學識」，「豐之以資財」，吾國工師必能「凌歐駕美」。只可惜大學專門甲乙種學校均薄視工師，不肯虛心研求實用之學。編者在此特舉京師著名的煉鋼鋪子王麻子為例，他說整條宣武大街上都有王麻子的招牌，卻不見得都是真的；冒用他人牌號是中國工藝不進步的原因，而各鋪不能合組工場抵制進口，更是一種缺乏公德心的表現；王麻子不用機器、沒有倒焰大爐，卻能煉出和西人一樣的鋼鐵，差別只在沒有著述傳世，又缺乏可供進一步鑽研的學校，是以「中

88 林傳甲，《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88。

臺灣大學學術規範

國」不能富強。[89]值得注意的是，編者在此提到缺乏專利觀念、仿冒、不團結及輕視實用之學，導致中國不能富強的論述，無一不是從「吾國」或「中國」的角度出發，說明編者看到的雖然是地方人文景觀，但他所採取和觀看的視角卻是一個具有全稱性的「國家」，如此走遍全國，這套論述模式似乎也能一體適用。

此外，類似上述以極為相近的觀點和放之四海皆準的視角詮釋地方人文景觀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有關孔教的描寫。13 冊《大中華地理志》無一例外，都有〈孔教〉一章，林傳甲述浙江省孔教時，首先提及子貢存魯霸越之功，強調子貢經商之道為後來實利教育的先驅，接著他將浙江一地所見之建築、村落、都邑、人物與孔教有關者一一納入，並由此推論「孔教為國家施教之本，政治所出，實為國教之深人心者」，「中國危而不亡，亡而能光復者，賴有教也」。最後，編者不忘提及岳飛之女岳銀瓶和上虞孝女曹娥的孝行，以及因此事蹟而建的孝女路和曹娥壩，說明「孔教崇尚貞節，全國同風」之理。[90]

孔教到了河南，子貢不再因事蹟而彰顯，而是因著祖籍地回到了故鄉。《河南省地理志》除列出子貢之名，子夏、公孫龍、顓孫師等皆因祖籍河南而名列榜上，歷代傳播孔教之賢儒，如韓愈、二程、張載等人亦因籍貫河南而有一席之地。[91]孔教的書寫，可以在這省，可以在那省，可以是孔子本人，也可以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或是歷代傳播過儒家思想的大儒，要不也可以是這些人一生足跡所到之處，都可以為該地的孔教記上一筆，最起碼每個地方一定不乏孝義懿行、貞節烈女，要找到豎立鄉里的節孝碑坊，證明「孔教崇尚貞節，全國同風」，顯然並不困難。中國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各地都有與儒家道德、倫理、思想、行誼相關的遺跡或人文地景，林傳甲對各地孔教的書寫，並不著意於儒

89 林傳甲，《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167。

90 林傳甲，《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頁 99-100。

91 林傳甲編纂，祝宗梁參校，林傳濤分纂，《大中華河南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頁 59-6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思想或綱常倫理落實到各地之後地域化的表現，僅載記各地皆有儒學傳播的人物與遺風，這種詮釋方式很容易讓人認為各省的地方情狀只是用以解釋「國教」的示例（typical examples）；均質化的書寫框架，讓各省彷彿只是從國家均分出來的單元，而單元與單元之間形式沒有差別，內容也大同小異。這樣的書寫框架，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想像，而非地方實態的捕捉和描述。

其二，筆者認為如果從一個比較整體的概念來看，《大中華地理志》隱隱然透露出一種國家認同超越地方認同的特性。林傳甲將《大中華地理志》放在一個均質化的書寫框架下，確實不太容易看出各省之間的差異，然而各個地方的山川水文、風土民情不可能沒有區別，只是這些區別會以什麼方式呈顯，往往與編纂者的書寫策略及其對地方與國家關係的處理方式互為表裡。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看到當年各省縣級學校協助林傳甲時所寫成的調查報告，各省地理志中必有的〈地方誌〉，也都經過總纂人或分纂人的過濾和篩選，因此，這 13 省《大中華地理志》雖不能完全呈顯當年所有參與編修者所欲繪寫的地方全相，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出林傳甲個人所欲建構的家國面貌，以及地方與國家認同。

林傳甲嘗言：「吾國不富不強，咸由不學；本縣人不可不學本縣事，本省人不可不學本省事。」[92]這話背後彷彿隱含一種假設：只要本縣人學了本縣事，本省人學了本省事之後，國家即可富可強，因此認識地方即是認識國家的基礎。然而，在認識地方的過程中，國家視角難道不會因此滲入，進而影響讀者對地方的認知嗎？編者於《京師地理志》介紹京師特有建物，如太廟、王府、貝勒府、使館、外國兵營、環城鐵路，及電報、電話等施設時，[93]無不忘述及晚清以至民初中國遭受外患及列強侵略之種種。述及京師舊有街道、特產時，則有如下一段描述：

> 大中華最盛之時，朝貢京師者，聲教廣遠。今國會參議院、眾議院，

92 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2。

93 林傳甲著，京師中國地學會編輯，《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67、309、311、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開會於象坊街，念緬甸貢象久絕，愛國者感想何如？市上藥商，猶標舉高麗別直野參、安南甜油貢桂、暹邏雪白官燕，都人其痛念藩籬之盡撤乎？……願都人食西貢米者，無忘安南，食仰光米者，無忘緬甸，用高麗紙，食高麗肉，高麗蝦仁者，無忘朝鮮。則借前席箸，運籌於平時，則他日興滅繼絕，大中華之國民，當引為匹夫之責乎。[94]

編者藉著象坊街、高麗蔘、甜油、貢桂、雪燕等至今仍在京師得見的街道景觀與物產、吃食，提醒讀者不可忘記那些曾是中國的藩屬，以及中國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失去這些藩屬的。[95]京師特有的建物、景觀、施設和物產，每每因其與近代史事相連，民族的屈辱、往日的榮光、國族的視角，皆因此一一灌注於地方事物的書寫當中，地方的特色也因其與國家的聯繫而被凸顯；林傳甲的《京師地理志》寫的既是地方，也是國家。

身為孔教會的一員，林傳甲的《大中華地理志》幾無一省無孔教，特別在孔子故里山東，所述孔教者尤多。例如〈山東之種族〉一章，首述世襲衍聖公及先賢世襲博士之譜系，並於介紹山東地方特殊姓氏仉姓時，強調「此為孟母之姓氏」。[96]述及〈山東之風俗〉時，一樣先提孔子事例，謂「孔子治魯，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感歎「聖賢之道，不敵人欲之私」，[97]只是這些事例與同章提及的山東梨花大鼓、日本「紅裙遠征隊」、乞丐、盜賊等，卻無多大關係。在宗教信仰方面，

94 林傳甲著，京師中國地學會編輯，《大中華京師地理志》，頁 319。

95 林傳甲由京師的街道景觀、物產、吃食聯想到中國過去的藩屬，為近代知識轉型時期讀書人常見的反應。潘光哲認為近代以來這類痛悼中國失去藩屬的論述，多少將這些藩屬視為打造現代國族想像時不可或缺的空間，是一種對中國國族應該支配空間範圍的「地理想像」。潘光哲，〈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476-486。

96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57-58。

97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71-7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述佛老必稱儒釋道三教同源，論回教則說「至今回教之民，稱孔教為大教，重國教也」，[98]彷彿山東一切地理景觀、生活習慣、種族語言無一不可與孔教相連繫，捨孔教之外，山東的地理書寫似乎就失掉一大半自己地方的特色。就連論及山東的基督教時，編者一樣從孔教的角度立說：

> 山東省城外，歷山之旁，新建齊魯大學。友邦之摯意，耶教之盛業，然為吾國之大恥，吾儒之大恥，不可不自省也。……夫吾國政府，不設國立大學，是政府無人，而後友邦憫吾國子弟之失教，而代執其教鞭焉，國權旁落自教育權始。……曲阜聖地，亦有教會所設之學校焉，然西人濡染儒書，彼教亦庶幾同化乎。[99]

在林傳甲的觀念裡，孔子故鄉、儒學重鎮居然有基督教大學在此設立，不但是「吾儒之恥」，也是「吾國之恥」，代表國權旁落，教權亦不復存。而歐戰結束前後，擾攘不安的山東問題，尤其觸發林傳甲的憂國之思及其對現實的危機感，因此撰寫於此一時期的《山東省地理志》便是他「寓倫理於地理」之作，以及寄寓儒家「修齊治平」理想的實踐。[100]在這樣的條件和立意下所書寫的地理志，顯然不止於傳達一地一隅之認同，保國保教的目的更是意在言外。

一生皆以他鄉作故鄉的林傳甲，對於故里福建始終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不論著述、講演，無不強調自己閩人的身分。1918 年林傳甲在西湖文瀾閣校刊《浙江省地理志》時讀《福建通志》，遂慨然而興書寫故里之志，[101]於是在堂弟林傳濤的協助下，寫成《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不知是長年流寓他鄉，還是調查鄉里得來的印象，林傳甲十分強調閩人勇於外徙、冒險犯難的精神。例如述及福建與國家的關係時，林傳甲以

98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67。

99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69。

100 〈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凡例〉第二條，林傳甲謂：「本編為聖賢桑梓，實國教精神所寄；各章多稱引聖訓經訓，寓倫理於地理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興利除弊之大經大法，咸在其中。」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3。

101 林傳甲，〈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9。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自身經驗表示：循南滿、京奉、東清鐵路而至吉林、黑龍江，「乃知我閩人拓地塞外，建功業，長子孫，卓然樹幟於大八旗之外者，則有吉林水師營、黑龍江水師營」。[102]為了證明此一特性，林傳甲還上溯康熙時期中俄尼布楚條約簽定前，林興珠率領福建籐牌兵水陸並進，擊敗內犯的沙俄軍隊之事，並稱「此閩軍北伐，屹為國防之大紀念」。[103]

除了拓殖東北之外，林傳甲強調閩人勇於離鄉向外開拓，例如湖南衡山縣湘水之濱，有林姓閩人以操舟見長，族人以駕駛帆船而致富；湖南靖州會同縣於清末歲考科考時，林姓秀才常居半數以上，當地有「無林不開榜」之諺。[104]在其他省的《大中華地理志》中，林傳甲極少論及個人或家族功業，唯《福建省地理志》例外，林姓閩人或個別對近代中國政經有貢獻的福建人，不時出現在《福建省地理志》各篇章當中。如戊戌政變中犧牲的六君子之一林旭，就是福建人；三二九黃花岡之役，為革命獻身的七十二烈士中，閩人就占了 10 位；辛亥革命爆發，福建閩侯林述慶自任江寧臨時都督，率軍攻下南京；民國以後，林森出任民元國會議長，負責推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凡此種種，看在林傳甲眼裡，皆為福建人之事功，閩人「手造大中華之功」實不可沒。此外，福建人亦長於經商，上海地區福州幫的商業勢力僅次於廣幫，廣福雜貨幾為各省各縣所通用。[105]

除了向內陸各省遷移之外，福建靠海，沿海居民以農工商拓殖海外者尤多。在〈福建對世界之關係〉一章，林傳甲提到福建人每年自廈門前往南洋群島者以千百計，亦有東赴美洲，西向歐洲，南往非洲、澳洲，這些人出外時只帶兩件單衣，不及十年回鄉卻成富豪，當地人稱之為「番客」，亦即公文書中所謂「華僑」。林傳甲自豪地表示：「此漳泉人民

102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15。
103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15。
104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16。
105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1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所特長也。」[106]在他眼中，閩人敢於冒險、長於外拓、擅於經商等特質，似乎皆因其與國家民族的利益攸關而更形顯豁。

漳泉向外開拓的長才也表現在臺灣的開墾和經營上。前清即已納入版圖的臺灣，也是福建人向外開疆闢地最好的實例，只是甲午戰後臺灣割讓給日本，對於原為前清一省的臺灣，林傳甲不論是基於民族主義還是故土之情皆不忍不談，他說：

> 日人所謂調查者，但取便於謀我之利權，不計及地方民生之根本。近日教育界主張，以外國文教外國地理，則日本人所著臺灣，視之如固有，且盜憎主人，大肆譏誚；茲以本國人定本國地理，完全為我國民自主之權。[107]

林傳甲嘗言日人多為謀取自身利益而調查中國，臺灣雖已割讓，但日本視臺灣為固有領土的觀點尤為林傳甲所難容。站在本國人寫本國地理的立場，林傳甲首先從《文獻通考》記載澎湖群島旁的毗舍耶國即臺灣之說寫起，[108]強調臺灣和中土的關係，並以絕大的篇幅講述有清一代在臺的建設和經營，力矯日人批評清朝「消極治臺」之說。例如談到設立行省前後的臺灣，出身福建閩侯的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奏請解除渡臺禁令，廣增縣治，其後更增設臺東直隸州，以十個月的時間打通臺東到花蓮的道路。[109]劉銘傳（1836-1896）來臺後則以「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為施政之標準，設立「撫墾局，行樟腦專賣，設學堂、練兵勇、造鐵路、開煤礦」等，凡百經營，就連日人亦稱美不已。林傳甲強調日人領臺後，莫不以沈、劉二人為先導，而臺灣在二百多年間，由清初始設一府，升為一道，復升一省，可謂「進化最速」。[110]

---

106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19。

107 《福建省地理志》第六篇〈附屬〉，以八章寫臺灣，一章寫澎湖列島，一章寫琉球列島。林傳甲，〈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凡例〉，《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4。

108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93。

109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95。

110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95、297。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庫

而後林傳甲對於臺灣的財政、教育、農工實業、銀行、商業、交通，皆以新舊對比的方式，敘列清朝和日本治臺事蹟，對於日本殖民臺灣之後的建設成果也有平情之論。像是林傳甲謂日人治臺 20 年，「無一處無精密之報告，其治屬地無異於內地，立法不紛，行政統一，官司得人，臺灣人民受治於異族，乃習而安之」。[111]對照於當時南北分裂的中國，林傳甲感慨「吾國內地雖號稱共和」，「有愧於日本之治臺多矣」！此外，論及臺灣新舊教育一章，林傳甲特以統計數字說明民心向背的變化，強調日人治臺後，臺灣私塾數量和學生人數逐年遞減，唯大正以後忽又攀升，主要原因乃是受到民國成立的影響，因臺灣人民「殆以民國成，則祖國強，彼將復為祖國之民，可不復習日本文字，此則日本之同化論不易實行也」。[112]這樣的看法不但說明林傳甲支持共和的立場，也反映他對臺灣重回祖國的期待。

相較於福建，林傳甲對湖北或許更熟悉些，畢竟那才是真正蘊育他成長的鄉土。他曾說自己是以「三楚之末學，領八閩之鄉舉」，[113]一個是真實的故土，一個是心靈的故鄉；如果說林傳甲在《福建省地理志》裡想表露的是閩人勇於外拓的性格，那麼他又是以什麼角度來寫湖北呢？或許我們可以從林傳甲描繪湖北省的位置看出端倪，〈湖北一月小寒大寒中星晷刻物候〉一章中有這樣的描述：

>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是為歲首。寰球萬國所同慶，即地球繞日橢圓軌道之最近點也。是日也，武昌起義之地，升國旗，唱國歌，公署學校放假，人民宴會，慶祝尤殷。……武昌革命應天順天，大易之革象也，象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南京政府，首以施行陽曆為第一大政，今政府學校，咸知世界趨勢，上合天行，遠孚萬國，偏陬愚民，多有仍沿陰曆者，亦昧

111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298。
112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頁 301。
113 林傳甲，〈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6。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於大易之革象，不知春秋之正朔，宣昭大義教育先覺有責焉。[114]

這是地理志例行介紹某地受經緯度影響的天文、氣象篇章。林傳甲在此先行擱置了湖北省元月份的節氣、日出日落時間、溫度、氣候等資料，反而著墨於元月一日為中華民國的開國紀念日，並以《易經》四十九卦「澤火革」之卦象說明武昌革命乃順天應人之舉，建議國人從今爾後當改正朔、遵陽曆。即此可見，林傳甲從介紹湖北省的地理位置開始，就把湖北和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關係緊緊聯繫在一起。

這種關係也體現在其後敘述湖北的種族問題上。林傳甲堅稱湖北為漢人世居之地，三代為夏禹之跡，荊衡江漢皆為九州侯服，華夏人民移殖甚早，清初時猶奉永曆為正朔；武昌起義，漢幟重張，種族革命終成政治革命，[115]湖北之功不可抹滅。為了說明湖北早具反滿復漢的意識，林傳甲甚至根據老一輩傳說，謂湖廣商人結帳，習用「清楚」二字，此乃前古所無，湖廣人相信「亡清必楚」，[116]而此一寓意可見湖廣反滿意識之早蓄。

在林傳甲的詮釋下，湖北早為華夏人民休養生息之所，近代以來湖北人民反滿復漢思想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源於武昌絕非偶然，非但前述湖北人種可見其端倪，山川水陸形勢及早發之地方自治皆可以為證明。林傳甲說：

> 武昌起義，全國響應，蓋京漢通軌，北出武勝，可以搗中原而掃燕雲；長江列艦，東下蘄黃，可以定金陵而通滬海。中華民國之成功，湖北之形勢，誠足為天下重也。強鄰如俄羅斯，大敵如德奧，亦隨從世界之潮流，改造共和國體，是武昌不徒為全國重，且為全球重也。蓋自神農起於厲山，早以民生為大本，陳涉張楚、徐壽輝亡元

114 林傳甲在這章裡還教導讀者在開國紀念日當天可以貼什麼樣的新年對聯，如「中華萬歲，民國元年」、「中華億萬歲，民國十一年」、「中華億萬兆歲，民國三十一年」，民國數字可隨之變化。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9。

115 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05。

116 林傳甲，〈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6。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皆前驅也。[117]

他特意把京漢鐵路通行、湖北控扼長江中游水域等地理條件與武昌起義和中華民國建立巧妙聯結。更有意思的是，林傳甲從「以民為本」的角度解釋共和國體，竟而上溯與楚地有關的神農、陳涉、徐壽輝等，並使之與當世改行共和政體的俄、德、奧等國等量齊觀，有意藉民主共和抬升湖北地位的意思可謂相當明顯。

此外，林傳甲以年少時之業師洪乾四的教導理解地方自治，他表示湖北地方自治雖自清季始，然僅有名無實，民國以後，地方自治停滯不前，十分可惜。林傳甲認為洪乾四晚年身體力行這套保甲之制，「調查五十二會戶口，儲備義倉，修葺道路，凡地方公益之事，無不手定章程，力行不懈」，[118]奠定湖北地方自治的基礎，可為他省典範，以為共和之根本。洪乾四對林傳甲人格與觀念的養成有絕大的影響，日後林傳甲也以極為近似的情懷和方法，撰寫各省地理志，不受薪、不設局所，不聘人員，卻能有極高的效率。只是這種近似鄉約的地方慈善互助事業和近代所謂的「地方自治」觀念，並不完全相同，其所有規劃與中央政府不產生任何關聯，就連地方行政機關和民意機關亦付之闕如，所有運作似乎只靠道德與理想維繫。林傳甲卻認為只要將湖北這套地方自治的方法推廣全國，不但地方自治成效可達，南北統一亦指日可待，而「今日民主民權，實湖北百年前耆獻之功」。[119]

林傳甲在《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各章極有意讓湖北成為肇建共和的推手，從地理位置、漢族血脈，到地方自治、民主民權，只要對革命與共和有直接、間接關聯的線索，都可以在湖北找到脈絡。林傳甲在論述湖北與全國關係時，還大聲疾呼要湖北人放棄「湖北主義」的觀念：

民國以來，湖北有湖北人之湖北一語，惜當首義初元，遽以「湖北

117 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45。

118 林傳甲，〈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6。

119 林傳甲，〈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自序〉，《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15-1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 主義」自封，致省界顯分畛域，不能自治，而徒致內爭，不能排外國，排外貨，惟以排外省人為務。今明達之士，已悟其非矣。敢正告我湖北父老兄弟曰：「湖北者大中華之湖北也。」[120]

這是其他省地理志極為少見的表述，林傳甲可說毫不掩藏地把湖北的地志書寫放在國家認同的框架下，要湖北人放下省界畛域，視湖北為「大中華之湖北」。某種程度來說，林傳甲認為當地方特色上升為國家認同的標記時，地域分野、地方認同的意義就顯得不是這麼重要了；在湖北之於民元共和的一切功業與特質，足以式法全國時，省界畛域之分，排斥外省之舉，徒然造成中國無法團結對外，兩相權衡，去省界以成國界或許才是成就國族最好的方法。

林傳甲在《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完成後曾表示，福建督軍李厚基（1869-1942）在看了《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說：「感奮傳甲生平，在閩亦不過三月，與江浙皖贛相同，視天下如一家，未嘗厚於閩也。」[121]林傳甲對於自己不偏廢一省、大公無私的態度頗為自得，他認為李厚基公允評價了他的工作態度。或許從國家主義的角度來看，李厚基所言無可厚非，但若從地方認同的角度解讀，一個福建人為家鄉所寫的地理志，讓人讀後覺得與其他地方無異，這樣的評語到底是褒是貶？換言之，如果地方與地方之間差異不大，那麼從縣到省，從省到國，彙總地方以成國家的目標就算達到了嗎？

換個角度來看，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差別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在編纂者有意的書寫策略下所呈顯的特色呢？林傳甲筆下的京師、山東、福建、湖北無一不具地方特色，但這些特色卻又像是從國家的視角所賦予的，因此林傳甲的《大中華地理志》，寫京師必事事與近代國家的外患和民族恥辱相連；寫山東則無一不可與國家當前的危難和保國保教的宗旨聯繫；寫福建則閩人所具冒險犯難、勇於外拓的性格，皆因其有功

120 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頁 318。

121 林傳甲，〈大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宣言〉，《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頁 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社稷而得以彰顯；寫湖北時就連山川水文、漢族血脈、鄉約自治都可以是構建民主共和的基石。林傳甲試圖找出既可讓地方感覺榮耀，又能體現國家民族大義或利國利民的特質，使地方特色和國家認同得以同軌並行。只是這樣的特色與其說是地方的，不如說是一套想像中理想國家形象的聯集，林傳甲在極力「求同」之時，卻有意無意忽略「存異」之於地方與國家的必要性，或許這正透露了地方之「異」，無論如何是可以消融在國家概念之下的；民國新成，國家待建，林傳甲心目中的「大中華」需要各省戮力以成，從「微分到積分」在這個意義下或許可以有另一種解讀。

結　語

國族認同和知識生產之間存在極為複雜的辨證關係。共和新成、歐戰危機，形構了《大中華地理志》以國家憂患為主軸的敘事結構；從微分到積分，由地方到國家的表述方式，也是林傳甲亟欲建構並傳遞給下一代的國族地理觀念。從某個角度來看，因應現代民族國家出現而生產的知識，同樣也將建構新一代的國族認同。《大中華地理志》以其十分特殊的出版、行銷策略，在民初競爭劇烈的教科書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和書商訂定預約寫作款的手法，讓林傳甲得以在短短 4 年不到的時間裡，寫成一部又一部的分省地理教科書。從最早的《大中華易縣地理志》在《地學雜誌》連載開始，到之後寫成的每一冊省地理志，《地學雜誌》都有清楚的報導和廣告，使得原本不盡相屬的兩個讀者群，在定期刊物和教科書彼此唱和及援引下相互串聯，[122]而預約折扣的行銷策略亦成功

122 潘光哲認為在 1895 年以前，表現人們「地理想像」的物質基礎，基本上仍以書本為主，如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即為代表；而 1895 年到 1920 年初的 25 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則改以報刊雜誌為主。潘光哲，〈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頁 463-46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打造市場預期心理。新時代的資本行銷手法既創造《地學雜誌》和《大中華地理志》在印刷資本市場雙贏的局面，也建構了共和時期新一代的地理知識。

《大中華地理志》透過一套內容極為近似的書寫框架，達成從微分以求積分，由地方以至於國家的地理空間想像，並有意與傳統方志包羅萬象的書寫內容有所區隔。某種程度上，這種「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概念，可說承襲了清末以來鄉土志、鄉土教科書裡「愛國必先愛鄉」的思維，把認識地方當成認識國家最根本的條件和最重要的基礎。然而問題是，這種認識論的核心照理來講應在地方而非國家，可《大中華地理志》均質化的書寫方式，以及國家認同凌駕於地方認同的特性，卻在在顯示出分省書寫的《大中華地理志》雖然有意聚焦於地方，實際上卻難以超越傳統方志長期以來由中央看向地方的視角，[123]以及以王朝國家為最終核心的書寫格局。在此視角下，地方特性不但可以被超越，往往還成為強化國家認同的來源。程美寶在討論地域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關係時認為，在中國，地方文化的存在並不會對國家文化造成威脅，如果一味地用二元對立的觀點分析地方和國家，對中國社會而言，其適用性是很有限的，因為決定如何書寫地方文化的讀書人，實際上從不認為自己代表基層、邊緣或地方，多數時候他們還是相信自己屬於「天下」，所以他們表述的觀點，不但表現出一種從上到下的國家意識，也往往帶有由下而上的對國家意識的理解和創造。[124]筆者認為處於近代知識轉型期的林傳甲，即帶有這種傳統地方士人的特性，《大中華地理志》即便用分省書寫的方式，想要深入地方，唯其所建構的地方卻不見得是真正的地方，反而更像是一種符合他對國家地理空間和文化想像的地方，這一現象或多或少透露出近代學人並不見得比傳統讀書人更了解什麼是

123 林開世，〈方志的體例與章法的權力意義：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國史館館訊》2009年第 2 期（臺北），頁 8-24。

124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 299-3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方」。

正如王汎森指出，儒家文化有其階級性，他們並不關心下層民間社會，下層人民的文化、思想、心靈、信仰從不被儒家主流文化所關心，地方上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所以傅斯年說：「這是儒家文化最不安定的一個成分。」[125]明代中期還有一些通俗的宣講活動，但是愈到後來這類具有草根性的講會漸漸只容許士大夫和有功名的人參加，特別是 17 世紀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士大夫階層對於「地方」愈來愈隔膜，[126]直到 19 世紀末、20 紀初期才漸漸有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此一現象也反映在地方志中，長期以來，地方志以書寫地方為目標，但實為朝廷中央和地方官員掌握地方狀況的工具，因此它有一套和中央官制相呼應的編纂體例和書寫框架，清楚表露出一種超越地域性的王朝統治秩序和儒家倫理的階序結構，而掌握方志書寫權力者又都是長期浸淫在儒家道統文化中的官僚和地方士紳，這些人不論在朝在野都是廣義國家政團中的一員，[127]由他們所寫的地方志書，往往只是國家視角的延伸和理想化之後的儒家社會，一般庶民的所思所想離他們是很遙遠的。20 世紀初，有些地方士人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因而提出應該重新纂修帶有民史觀點的地方志，如浙江學人陳懷（1877-1922）就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陳懷和林傳甲是同一時代人，生卒年相同，家庭背景、學識涵養與歷練皆相仿，父親早逝，自幼跟隨叔父陳黻宸（1859-1917）讀書，1902 年協助陳黻宸在上海辦《新世界學報》，經常在學報上發表文章。在一篇名為〈方志〉的文章中，陳懷曾說：

125 語出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大陸雜誌》1 卷 11-12 期（1950 年 2 月，臺北）；後收入傅斯年撰，陳槃等校訂，《傅斯年全集》第 6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頁 2124。

126 相關討論可參考：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收入羅志田、徐秀麗、李德英主編，《地方的近代史：州縣士庶的思想與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8。

127 關於國家是為君臣結合的政治團體，可參考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207-258。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 自嬴秦以降，掌故闕如，我每慨我國通人之修方志者，徵文考獻，侈求典雅，一邱之貉，異軌同奔，故雖轄地數萬里，歷世數千年，典冊如雲，文士如鶩，而卒無當於民義發達之故，政治進步之由。[128]

或許正是基於想要了解那個由下層人民所組成的地方，陳懷才會批評過去的方志只能沿襲「私史常例」，詳於沿革卻略於徵風化，善於鋪張史事卻無法激發民意。其所謂「一邱之貉，異軌同奔」並不僅是一種形容，陳懷批評的正是傳統方志長期以來帶著由中央看向地方的視角，所以一個個看似不同的地方，一冊冊如雲的典籍，皆無法發達民義。他認為只有重寫以人民為主的地方志，才能從地方通往國家，由國家走向世界，即所謂「必由一民而積之，而一邑，而一州，而一國，而一球，而後有史」。[129]這種由地方通往國家，再由國家走向世界的方向，顯然和傳統方志以國家統攝地方的概念截然反背。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陳懷對於新修方志的構想和林傳甲「從微分到積分，由地方到國家」的概念若合符節；他們都意識到傳統方志裡的地方只是國家鏡像的折射，在這面鏡子裡沒有生民的喜怒哀樂、所思所想，所以陳懷才會說「方志者，純乎其為民史者也」，[130]林傳甲希望帶著學生調查地方，他們迫切想要了解的是那個人民真正休養生息的所在，以及地方典籍未曾載錄的「地方」。包括清末以來鄉土志、鄉土教科書的風潮，其實都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的，只不過那樣的「地方」並不那麼容易出現，陳懷來不及親寫一部理想中的地方志，而林傳甲的《大中華地理志》也免不了帶有凌駕地方的國家意識。欠缺對地方社會的了解與地方志長久以來缺乏人民的視角是一樣的問題，像陳懷、林傳甲這樣的學人，和其他許多在知識轉型期從事地志書寫的學者一樣，他們雖然急欲了解地方，卻並不見得真正知道地方是什麼。所以為了深入

128 陳懷，〈方志（下）〉，《新世界學報》壬寅年第 7 期（1902，上海），頁 36。
129 陳懷，〈方志（上）〉，《新世界學報》壬寅年第 7 期，頁 31。
130 陳懷，〈方志（上）〉，《新世界學報》壬寅年第 7 期，頁 2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了解地方，他們不但從文獻上去檢索地方的「過去」，更直接去調查每個地方在他們所處的「現在」是個什麼樣子，於是乎地方調查便成為他們撰寫地志時最常用的手法。可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些 20 世紀初強調地方調查的書籍，卻往往把調查所得的資料淹沒在自己的撰作中，使得讀者並不容易分辨那些是編者根據眾人調查所得的紀錄，那些是他自行探訪的結果，以及那些是編者從舊志或他撰中採輯而來的看法。後人只能看到編者「合眾人之力」的成果，卻不了解編者如何處理並理解這些調查所得的資料；林傳甲遺留下來眾多的省縣地理志都有這個問題，目前看來在他所有的撰作中，大概只有由他掛名總纂的《京師街巷記》是唯一一部保有調查者眼光和調查方法的著作了。

這部原本打算出版 20 冊的《京師街巷記》，是林傳甲在北京教授半日制學校時，動員學生分區調查京師街巷的成果紀錄。從目前唯一出版的京師「內左一區」來看，[131]林傳甲顯然對於調查員應該調查那些項目、記錄那些內容都有大致的規範；一般來說，區域內的街道、胡同、建物、古蹟、學校、市場等是為主要的調查對象，調查項目則包括了該處的地理位置、地名由來、清末以來的地理沿革變化、周邊建物、商店、住家人口等等，有時也會載錄一些該地著名的事蹟或與近代歷史相關的人事物。這些調查內容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林傳甲想要突破傳統方志從儒家倫理和統治者視角觀看地方的意圖。然而，由於林傳甲動員的調查員多半是召募而來的學校師生，不太可能經過長期的培養訓練，和日本人編纂《支那省別全誌》時，動員東亞同文書院訓練過的學生不同，所以他們採取的調查方法不是觀察就是訪問，並沒有大規模或長時間的統計數據；整體而言，調查目標以呈現街巷、建物的現況、地名由來，加強一般人對本鄉本土的認識為主。因此這類地方調查的重點和方向，雖然和傳統方志從知識（統治）階層觀看地方的視角不盡相同，但是這種從歷史（時間）脈絡認識地方（空間）的角度，仍然保留了過去沿革地理一

131 林傳甲，〈京師街巷記總序〉，《京師街巷記》，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貫的思考模式，不脫傳統方志和鄉土調查的風格。

不可諱言，清末民初的地方學人想要了解地方，想要從民的角度重新認識地方，意圖奮力發掘那些為知識（統治）階層忽略的地方特性與地方價值，只是地方意義的重新界定，勢必牽動地方和國家之間整體的關係。《京師街巷記》的調查方法和視角，透露出林傳甲意圖翻轉地方的重要性，可是一旦回到林傳甲自己主導編修的《大中華京師地理志》裡，那些可以凸顯地方特色的調查資料似乎又消融在以國家為主體的敘事當中，現實的憂患和國家民族認同依然是左右林傳甲書寫視角的重要關鍵，而《大中華地理志》顯然還在地方意識和國家認同之間擺盪。

*本文曾於 2014 年 8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得評論人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指正，並感謝與會之黃克武教授、吉澤誠一郎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撰寫過程中蒙李帆教授、成一農教授提供多種資料，特此一併致謝。

（責任編輯：石昇烜　歐陽宣　校對：洪麗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中國地學會啟〉，《地學雜誌》1910 年第 1 期，天津，頁 1。（本文引用《地學雜誌》為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重印本）。
〈各省紀聞：林傳甲君之地理新著〉，《教育周報》228 期，1918，杭州，頁 8-11。
〈地學雜誌敘例〉，《地學雜誌》1910 年第 1 期，天津，頁 1-2。
〈長沙社會調查面面觀〉，《新青年》7 卷 1 期，1919 年 12 月，上海，頁 96-108。
〈學務處咨各省督撫編輯鄉土志文〉，《教育雜誌》第 7 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4 月，天津，頁 11。
易縣中學初編，林傳甲、連德純著，〈大中華易縣地理志〉，《地學雜誌》1917 年第 5 期，天津，頁 39-41；1917 年第 6、7 期，頁 46-80；1917 年第 8、9 期，頁 19-23；1918 年第 2、3 期，頁 49-66；1918 年第 4、5 期，頁 16-27。
林傳甲，《黑龍江鄉土志》，宣統年間刻本八冊。出版項不詳。
林傳甲，〈大中華地理志序例〉，《地學雜誌》1916 年第 4、5 期，天津，頁 83-86。
林傳甲，〈擬編大中華地理志各省各縣分纂綱要〉，《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天津，頁 97-99。
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地學雜誌》1916 年第 6、7 期，天津，頁 31-39；1916 年第 8 期，頁 17-39；1916 年第 9 期，頁 24-30；1916 年第 11 期，頁 6-10；1916 年第 12 期，頁 11-15。
林傳甲，《大中華江蘇省地理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林傳甲總纂，林懷民校勘，《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地不詳：浙江印刷公司，1918。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校勘，《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南昌：裕成印刷公司，1918。
林傳甲，〈大中華京兆大興縣、宛平縣地理志徵文通告〉，《安徽教育月刊》1919 年第 21 期，安慶，頁 12-14。
林傳甲著，黃昌壽校刊，《大中華安徽省地理志》。北京：中國地學會，1919。
林傳甲著，京師中國地學會編輯，《大中華京師地理志》。京師：中華印書局，1919。
林傳甲著，楊鐮、張頤青整理，《大中華京兆地理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據 1919 年 10 月 10 日中國地學會初版重印。
林傳甲總纂，鄧宇安校閱，《京師街巷記》。北京：武學書館，1919。
林傳甲總纂，阮麟運分纂，《大中華湖北省地理志》。武昌：永盛印刷局，1919。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福建省地理志》。京師：中國地學會，1919。
林傳甲總纂，林傳濤分纂，《大中華山東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
林傳甲總纂，蘇莘分纂，《大中華直隸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
林傳甲編纂，祝宗梁參校，林傳濤分纂，《大中華河南省地理志》。北京：武學書館，1920。
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北京：中國地學會，1921。

臺灣大學博物館數位圖書庫

林傳甲、朱希祖、吳梅著，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林傳甲，《黑龍江教育日記》，收入況正兵、解旬靈整理，《林傳甲日記》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陳　懷，〈方志（上）〉、〈方志（下）〉，《新世界學報》壬寅第 7 期，1902，上海，頁 30-35、35-40。

屠　寄，《中國地理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版，宣統三年（1911）11 版。

張星烺述，《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

張相文，《增訂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南洋公學編譯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第二次印行。

馮天瑜、劉柏林等編，李少軍等譯，《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資料選譯》1-3 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厲時中編，《大中華山西省大同縣地理志》（民國 9 年石印本），收入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 15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學部，〈鄉土志例目〉，夏雲程纂，《銅梁縣鄉土志》，收入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輯，《鄉土志抄稿本選編》第 11 冊，頁 307-323。北京：線裝書局，2002。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1920；本文採用南天書局 1988 年影印本《中國省別全誌》。

清國駐屯軍司令部，《北京誌》。東京：大橋新太郎，1908。

雄松堂編，《東亜同文書院中国調査旅行報告書》（原題《支那調査報告書》）。東京：雄松堂，1996。

二、近人研究

王汎森，〈近代中國線性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 卷 2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1-46。

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收入羅志田、徐秀麗、李德英主編，《地方的近代史：州縣士庶的思想與生活》，頁 1-2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余來明，〈清民之際「文學」概念的轉換與中國文學史書寫——以林傳甲、黃人兩部《中國文學史》為例〉，《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吉安，頁 99-104。

沙培德，〈敘事與教誨：教科書中的知識傳遞（1902-1937）〉，收入沙培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頁 231-270。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開世，〈方志的體例與章法的權力意義：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國史館館訊》2009 年第 2 期，臺北，頁 8-24。

胡博實，〈林傳甲與黑龍江近代教育發展〉。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胡曉真，《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范玉秋，《清末民初孔教會運動研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6。

孫　江、黃東蘭，〈作為事件的他者——近代中日歷史教科書裡的前近代敘述〉，收入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頁 179-18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徐　泳、楊鐮，〈北京人文地理第一書——大中華京兆地理志評介〉，《全國新書目》2013 年第 7 期，北京，頁 52-53。

郭　琳，〈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胡適《白話文學史》比較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郭雙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陳國球，〈文學史的名與實——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考論〉，《江海學刊》2005 年第 4 期，南京，頁 170-175。

傅斯年撰，陳槃等校訂，《傅斯年全集》第 6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程美寶，〈由愛鄉而愛國：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北京，頁 68-84。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1815 到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劉欣芳、王秀蘭，〈黑龍江近代教育奠基人林傳甲一家對黑龍江教育的貢獻〉，《教育探索》1997 年第 5 期，哈爾濱，頁 61-62。

潘光哲，〈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頁 463-50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韓　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韓子奇，〈進入世界的挫折與自由——二十世紀初的《地學雜誌》〉，《新史學》19 卷 2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151-177。

並木賴壽、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0。

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中国大調査旅行の研究》。東京：大明堂，2000。

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 卷 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1-40。

Ching, May-bo.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place Textbooks and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azetteers.” In Hon and Culp,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pp. 55-77.

Hon, Tze-ki. “Educating the Citizens: Visions of China in Late Qing History Textbooks.” In Hon and Culp,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pp. 79-105.

Hon, Tze-ki. “Marking the Boundaries: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Republican China.” In Moloughney and Zarrow, *Transforming History*, pp. 303-333.

Hon, Tze-ki, and Robert J. Culp, e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Moloughney, Brian, and Peter Zarrow, eds.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Zarrow, Peter. “The New Scho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In Hon and Culp,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pp. 21-54.

Zarrow, Peter. “Discipline and Narrativ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loughney and Zarrow, *Transforming History*, pp.169-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9 (June 2017), pp.119-170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3

Rewriting Local and Imagining Nationhood: The Compilation of *Great China Geography* as Case Study of Local /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iu, Long-hs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geography narratives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Great China Geography* (*GCG*) documented by Lin Chuanjia,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and analyzes how this documentation won recognition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textbook market of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t also examines the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notations behind the narration of imagined nationhood through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stensibly, *GCG* was a textbook attempting to develop local awareness, a framework that derives from the notion of 'love your hometown before love your country' of local gazettes in the late Qing. However, despite the complicated spatial divergence in various regions, there is a homogenization of national supremacy (over local identities) underscoring the narration of *GCG*. The sense of existential crisis triggered by WWI reinforced this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cultivation underneath *GCG*'s seeming local awareness developm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No.70, Linhsi Road, Shihlin District, Taipei 11102, Taiwan (R.O.C.);
E-mail: longhsin.liu@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CG can be treated as a legacy of late-Qing local gazettes, yet Chinese intelligentsia who lacked appreciation of local spirit still had a long way to go to construct a genuine local identity.

Keywords: Lin Chuanjia, *The Great Chinese Geography*, the writing of local history, local, nation, ident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